

後冷戰時期東南亞 戰略操作的多重困局

中國 vs 東協*

何耀光**

收稿日期：2014 年 3 月 19 日

接受日期：2015 年 2 月 26 日

* DOI:10.6164/JNDS.14-2.2。

** 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社會科學博士；現任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專長研究領域：地緣政治與地緣戰略、海洋發展史、國際關係理論、國際安全、戰爭研究、現代史、區域研究。E-mail: walterho61@isu.edu.tw。

摘 要

後冷戰時期東南亞地區的安全戰略態勢，存在共同的特徵，即各方都面臨著安全戰略操作時的多重困局。在國際權力競逐狀態下，東協各國顯得相對弱勢、內部整合困難加上強權介入，幾乎成爲一種宿命。而中國崛起需要穩定、安全的周邊，但大國崛起所引發鄰國的不安，卻難以擺脫。事實上，東協與中國的戰略操作都在美國海洋秩序約制之下，形構其相對應的作爲。而在地緣限制下，戰略選擇的約制來自於國際權力結構，也來自於決策階層的安全認知與國內政治勢力的影響，此點則是思考東南亞戰略的本質時重要的檢驗。

關鍵詞：南海爭議、海洋秩序、亞太熱點、東南亞地緣戰略

壹、前言

面對「中國崛起」的事實，無論論者的立場如何，均無法忽視北京在 21 世紀國際政治與事務上的角色，中國的影響力逐漸擴大與相對削弱的美國成為顯著的對比，當霸權的全球影響力逐步下滑之際，國際權力結構與東亞政經秩序的轉變，似乎已成不可逆的趨勢（Mahbubani, 2008；Drezner, 2007: 34-46；Zakaria, 2008: 18-43）。然事實果真如此？抑或只是假像？若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來觀察後冷戰時期東南亞地區的安全戰略態勢，則可以發現無論是對於涉入區域事務的強權，或是東南亞各國本身，其共同的特徵都是面臨著安全戰略操作時的多重困局，其中諸如日本的政治大國意圖、美國的重返亞洲、中國的睦鄰外交等等均遭遇多層次的挑戰；相同的，東協各國也都面對著相類似的情形。對東協而言，最接近、最直接的威脅，係來自於地緣上的近鄰—中國，然中國崛起是事實，而如此事實是憂是喜，卻一直還在未定之天。對於中國崛起，在其周邊與西方國家看來，焦慮的核心在於觀察與感知「是否中國能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及「是否遵守國際規範、實踐國際間的基本價值？」（Kleine-Ahlbrandt and Small, 2008: 38-56；Kagan, 2008）而非中國自己的宣傳與想法。整體來說，中國崛起的國際社會關注焦點在於，強大與自信的中國將會如何對待鄰國，而周邊國家對中國影響的增強又會有如何的反應（Shambaugh, 2004: 64-99）。故本文將以後冷戰時期在美國海洋秩序下，中國與東協的戰略分析為主軸，討論其各自相對應的戰略操作與限制，進而探討在地緣限制、戰略選擇等因素影響下，戰略困境的本質與區域戰略形勢的前景。

冷戰結束之初，在普遍悲觀的看法中，自由主義者認為，由於地區缺乏民主機制與經驗、經濟的互賴與多邊機制，故穩定與和平

難以實現；現實主義者則認為，中國崛起必將引發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也將會成為不滿現狀的「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 states），強國之間的緊張與衝突關係，必然引發多極的結構衝突，而對區域的權力平衡與和平狀態構成嚴重挑戰（Segal, 1996: 107-135；Friedberg, 1993: 5-33；Betts, 1993: 34-77；Kupchan, 1998: 62-66；Johnston, 2003: 5-56）。雖然，二十餘年來，嚴峻的國際爭議與衝突雖未在東亞地區上演，但也不能就此認定為某種設計的機制，所建構出的和平態勢，反而卻更像是一種偶然的和平狀態（Kim, 1997: 54）。中國是否「和平崛起」？至今並無定論；相對的，東協諸國的整合是否能發揮預期效果，抑或整合也只是回應全球化趨勢的一種階段性策略，而資源不足的眾小國有無能力與區域強權分庭抗禮，這一連串的疑問也是爭論的主要議題。其中，在權力結構上的事實，係當前霸權穩定機制的逐漸弱化，致使區域安全的不穩定因素愈見明顯。而當跨國經貿往來與安全合作機會在東亞各國的經濟快速成長狀態下愈來愈重要之時，區域內各國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力相對也逐漸提升，然而大國之間的戰略競合關係持續存在，亦導致區域「經濟發展」與「戰略競爭」的態式並存（Roy, 1997: 51-56；Dibb, 1995: 20）。於是，國際關係的各學派由不同的思維理路切入議題討論，就成為當前東南亞戰略與國際現實預測過程中紛亂意見雜陳的主因。但就實證的觀點來看，地緣結構的約制依然是各方戰略操作的認知核心。

本論文即思考在美國海洋秩序的約制下，中國在「大國崛起」過程中的戰略選擇與東協面對中國威脅而試圖引進各方勢力操作大國間相互約制的對策。¹ 就問題意識來看，中國崛起既然已經是「事

¹ 澳洲學者 Evelyn Goh 將此操作策略稱之為「全面羈絆」（omni-enmeshment）戰略，係藉由東南亞本身的戰略資源與利益，吸引各大國的關注與投入，在使其相

實」，因此，關注的焦點應在於其崛起的意圖與可能的途徑。然而，在邏輯上，雖然意圖會決定戰略途徑的方向，但也不能忽視在國際戰略形勢轉換後，修正的可能。而對於中國崛起的問題，各種不同的國際關係理論之間，有著截然不同的論述、理解與預測，到底中國的崛起是「威脅」抑或是「和平」？中國本身如何定位、如何面對這樣的質疑？強權國家又是採取怎樣的態度來認知這個議題，則是本文第一個要處理的問題。其次，相對應中國的崛起，東協國家又是採取如何的反應來應對此一形勢？又是如何在強弱對比懸殊的狀態下操作？以及這樣的操作是有效、抑或是強權默許下的假象，則是另一個要處理與釐清的概念。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在現實戰略環境中，美國的海洋秩序依然是目前與可見未來的支配架構，討論區域間的權力分配問題，美國因素依然是佔有關鍵的重要性，因此，無論中國或東協的戰略作為，基本上也都還是屬於美國秩序約制下的反應，但同樣的，美國國力的逐步衰落也是事實，霸權支配的鬆動是否有其他的影響，單純權力結構的分析似乎已不能解釋、說明這一切，如何清晰的樣的關係變化，則是下一個要積極思考的問題。

以上種種的問題，在國際關係諸理論之間的學派爭議上，無論在認知威脅的界定、分析，或是詮釋與預測上，顯然都存在論證的爭議。於是，本研究將以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為分析基礎，由地緣權力競逐的發展過程，探討東南亞的地緣戰略環境與發展趨勢，並針對東協的全面羈絆戰略操作與中國的大國崛起策略，分析其間各自的戰略設計、運作與侷限，並以此形構東南亞戰略的本質性理解，作為觀察區域戰略態勢前景的基礎，並加入美國因素，以分析各方

互之間，因利益爭奪而相互約制，營造東協國家的生存空間，藉全面的操作議程、廣泛的主導議題，以求得東協最佳的利益與戰略位置。

的戰略發展。

貳、強權崛起的認知與理論的理解

對中國崛起的威脅感，並非當今的產物，早在 1990 年 8 月，日本防衛大學副教授村井友秀（Murai Tomohide）在《諸君》月刊發表「論中國這個潛在的威脅」專文，探討中國在國力發展後成為潛在敵人的可能（村井友秀，1990：186-197）。到了 1992 年以後，西方國家媒體、專家、政治領袖亦多對此表示憂慮，英國《經濟學家》的「當中國醒來時」、美國傳統基金會《政策研究》的「覺醒的巨龍」等等專文，逐步使「中國威脅論」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議題；而 1997 年，Richard Bernstein 與 Ross H. Munro 更以專書指出中國將在 21 世紀成為世界的主導力量，成為美國的長期敵人（Bernstein and Munro, 1997a）。

事實上，自 1980 年代中期以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進展，以龐大人口、廣闊幅員與豐富資源條件，建構出的驚人經濟成長，對美國在東南亞甚至亞太區域的權力平衡操作，造成嚴重影響。為因應美中可能的競爭、地區不確定性、潛在戰略對手挑戰等情勢，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關切已逐漸轉向中國。後冷戰時期開始，美國的戰略選項已由傳統的「交往」（engagement）與「圍堵」（contain），再加入「圍和」（congagement）這第三條路線。如此情況也說明，美國的超強地位雖然有著單極支配的實力，並可透過海洋秩序的操作來鞏固其霸權，然而，全球霸權並不意味著能直接、排他的擁有支配所有區域的能力（Ross, 1999: 83）。事實上，美國秩序建構係由霸權國家提供安全秩序、負責地區安全事務的管理、維持地區穩定與和平等多重面向來建構（Ikenberry, 1998: 43-78）。然學界對此問題的理解，卻也出現看法分歧、各有論述的情形。也

因此，以下將以體系衝突、功能溢出、東協模式為例，討論當前主流理論在解釋東南亞戰略時的侷限性。

一、崛起強權與現存體系之間的競合關係檢驗

就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安全」是國家關切的核心，而霸權國家所形構的霸權秩序，係以維護體系秩序的穩定為目標，以其國力優勢提供公共財、制定規範，透過強制力（軍事、政治）與互惠機制的交互運作，以維持秩序，並防止敵對國家對體系邊緣的滲透與影響，進而在維持秩序的同時，達成增進霸權國本身的安全。也因此，在國際「無政府狀態」（Anarchy）局勢下，小國為求本身的安全保障，自然在行為上將傾向於優勢國家，以取得保護或庇蔭（Kindleberger, 1981: 253；Kindleberger, 1986: 7；Calleo, 1987: 14；Mendez, 1999: 404；Keohane, 1989: 44-45；Desch, 1989: 98；David, 1989: 59-61；Walt, 2002: 10；Emmerson, 2005: 1-21）。而東南亞諸國在冷戰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似乎也驗證了現實主義的論點。然而，地緣的距離因素加上經濟情勢的轉變，使得問題的複雜性愈來愈高，當主導性大國（dominant power）地位逐漸下降，如中國這樣崛起中的大國（rising power）地位不斷上升，就「權力轉移」觀點來看，中國必將爭奪主導地位，國際體系將轉趨不穩定，相對衰退的霸權國家，會利用其軍事優勢或貿易保護等方式，試圖排除新興國家的挑戰與威脅。於是，權力轉移所形成的權力結構變化，將使利益衝突加劇，持續性的戰略競爭態勢不可避免，大國間的安全競爭與權力衝突，即有導致戰爭的危機，於是中美衝突即呈現出無可避免之勢（Organski, 1968；Gilpin, 1988: 591-614；Copeland, 2001；Mearsheimer, 2001a）然而，如此的論述，在後冷戰時期的東南亞國際政治實踐中，卻並未真正的發生，現實主義理論群的「必然衝突」認知，乃是假設新興大國必將扮演修正主義角色（Kim, 2002: 658），

而在後冷戰時期的東南亞戰略實證之中，並未全然得到證實。若以中國近年來處理領土與領海爭議的途徑來觀察：消弭衝突根源與防止衝突發生這兩種模式（Wang, 2003: 398-399），係藉由尋求全面重新劃界、維持疆界「現狀」穩定為核心操作，透過雙邊協商，防止衝突發生。另外，觀察中國的國防白皮書，其中有關武力運用部分，也發現除了防範外敵之外，還包括參加國家建設、搶險救災、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國際災難救援等等軍事和平用途（國務院辦公廳，2011），如此看來，中國的戰略回應與「必然衝突」的假設，實則相去甚遠。

二、功能性合作的外溢效果與大國崛起之間的關係檢驗

就自由主義的觀點來看，國際關係雖有無政府狀態的先天特質，但多邊國際體制卻可提供一種機制平台，以降低衝突、減低安全兩難的困境，透過國際體制的運作使體系結構趨於穩定，形成長遠和平的可能。此運作邏輯係認為，體制的約制功能，提高國家行為的「可預測性」，而體制的互惠設計使利益透過交換而趨於滿足；成員國之間的行為表現與體制運作的連續性，更使和平期望持續被驗證；透過機制平台解決爭議與衝突，創造穩定和平的發展空間（Nye, 2000: 43；Keohane, 1984: 59-64；Krasner, 1983）。而在中國問題上，則藉由「全面交往」（comprehensive engagement）以國際體制與規範約制崛起的中國，使其採取合作態度而不致威脅區域和平。亦有論述認為藉經濟合作將可尋求中國在限武等重大議題的合作，而日、韓等軍事同盟，則作為防範與因應。然而悲觀者則主張，面對權力競逐的國際結構，強大的中國勢必進行擴張，而將威脅到美國的安全與國際支配地位（Bert, 2003；Lampton, 2003: 37-48；Economy, 2005: 409-425；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2000: 63；Kerrey and Manning, 2001: 17；Vaughn and Morrison, 2006: 1-37；

Johnston, 1999 ; U.S. Commission on National Security/21st Century, 2000: 9-10 ; Rice, 2000: 45-62 ; Goh, 2007a: 809-832 ; Rachman, 1996: 129-139 ; Waldron, 1995: 17-21)。以上各方的論述，除了概念認知上的歧異之外，實證上，美日與東南亞諸國，均在政策與戰略上，將中國視為競爭或敵對國家；而東協各國之間的歷史糾葛與經濟利益衝突，亦未如功能主義所預期（Nye, 1971: 56-58），由相互依賴進而「外溢」（spillover）更高層次的整合。因此，無論東協區域論壇（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東協加一等等機制，在南海問題上，並沒有實質而有效的應對與協調、約制能力。以東協區域論壇為例，論壇的運作並未能阻止、預防南海問題的惡化，最多也只是提供各方各自論述的空間，而在實質上，卻應證了美國的存在才是區域安全的基礎（Emmers, 2001: 278-79）。例如 2014 年，在緬甸召開的第 21 屆論壇，會議題範圍甚廣，包括烏克蘭危機、敘利亞、伊斯蘭國、朝鮮半島、以巴衝突、南海爭議等等（ASEAN, 2014），但即便涉及東協國家的馬航 MH17 班機誤擊事件、南海爭議事件等等，會後除了諸如呼籲和平解決、人道關切等等官式外交辭令之外，基本上沒有任何實質上的行動方案，甚至連嚴肅的譴責都沒有，這也可見其實質性功能的局限，更說明了單純的自由主義理解，並不能完全解釋當前的東南亞戰略局勢。

三、東協模式的檢驗

就建構主義觀點來說，基本上是認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與自利傾向，源自於國家間的互動而非國際結構，權力政治係基於各國間的「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s）認知而來，國家與國際體系之間的相互建構關係，形塑行動者與社會結構的互動，行動者可藉其作為來改變社會結構，進而影響行動者的認同與利益認知。經濟互賴或內、外部共同敵人等等因素，將促使國家願意接受國際規範與

行為約制，而此規範效果的建構來自於國內結構、機制影響的擴張、社會認知等等。參與此社會集體認同的行動者，即藉由集體行動在結構網絡、系統過程與策略務實的機制之中，創造出自我價值、形成集體的利益（Wendt, 1994: 384-396；Checkel, 1999: 83-114；Mercer, 1995: 231-235；Wendt, 1992: 391-425）。於是，透過國際結構的意義以及對社會價值的理解，國家利益與國家行為就能被界定與理解（Finnemore, 1996: 1-33）。故建構論者經常會認為，所謂「東協模式」（ASEAN Way）就是透過非正式與協商一致的原則，一方面以有限的制度化形式組建區域合作。一方面藉「一致性」避免多數表決與強制執行，使參與者的舒適感、接受度提升，進而逐步達成其目的（Acharya, 1997: 328-333）。至於東協國家拉攏中國參與區域事務的目的就在於建構互動模式、以預測及「社會化」（socializing）中國的對外行為模式，以穩定區域發展（Ba, 2006: 157-179）。以南海爭議為例，海上資源運用與支配的迫切感來自於，經濟發展使相關國家的資源嚴重短缺，理論上將有助於各方因經濟利益的必要性而展開合作，然而事實上，由於各方均未放棄各自對南海主權歸屬的宣示，國家領土完整的認知依然存在，共同開發只成為追求利益目的中，須暫時讓渡主權時的說詞（Valencia, 1986: 682-684）。於是，在安全實務上，東協國家的作為又回到權力平衡的思考，例如，在南海問題上，東協的戰略選擇，依然是以積極爭取美國來平衡中國的影響力為戰略操作核心（Brown, 2011: 1-15）。另外，再以「南中國海非正式會議」（South China Sea Informal Meeting）的運作為例，其理念是：防止爭議突然爆發，避免演變成衝突，限制衝突的擴大，試圖以預防外交方式，避免爭端演變成武裝衝突（Djalal and Ian, 2000: 107-133）。但如此「第二軌道」（Track II）的努力，依然在問題涉及國家主權的狀態下，難以取得實質進展。因此，筆者認為，所謂的「東協模式」基本上只是強權秩序下的一種諒解與默

許，東協各國在相對國力不足的狀態下，加上各自歷史經驗的影響，在安全問題上，表現出「主權獨立」就成為對抗內、外壓力，確保各自政權正當性建構的基礎（Chung, 2007: 64-65），也因此，區域合作過程中，談判妥協已不再只是國際層次的問題，更涉及內部政權維繫的相關，而難以用單一的機制與途徑來解決問題。

四、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可能性

就國際政治操作與實踐的觀點來看，如何創造更安全的戰略環境，還是國際政治與權力競逐所關切的焦點（Snitwongse, 1990: 40-41）。若以「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的研究途徑來看，由於研究視野係自國際拓展到國內甚至個人層次，除原本的國際結構因素之外，更加入國家層次和個人層次變數來解釋國家行為之全面性綜合分析的特質，相對於現實主義的認知，也就是加入了「國家利益認知」的分析因子。在相當程度上，有利於理解東協國家企圖引導國際體系向其目標與偏好來發展的趨勢，並對國力強弱的外交政策影響力變化，以及受到國際政治影響時，國家結構、政治菁英的心態轉換與回應國際政治的方式與手段等議題，提供有效的理解與認知途徑。在權力問題的理解上，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國家不但關切國際權力分配，同時也積極塑造有利於國家利益實現的環境與國家的國際影響力，而在策略上採取各種不同的應對手段。對於願意付出高昂代價的「維持現狀」（status quo states）國家而言，安全是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故「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策略成為選項，至於不願付出高昂代價者，傾向於採取「扈從」（bandwagoning）策略。即使「修正主義國家」也有代價方面的考量，採取對外擴張政策的國家相對願意付出，相反者則傾向於「規避責任」（buck-passing）策略的操作。此部分與現實主義在認

知體系霸權的國際秩序操作問題上，有明顯不同的理解。² 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在有限的選擇空間下，決策者外交行為的選擇，成為重大的影響關鍵。國際體系的壓力固然是重要的變項，但對此權力分配的因應，則是以決策者的感知來形構國家的對外政策與行為。然由於國際權力分配的精確客觀分析甚為困難，因此，國家決策時通常受到決策階層經驗的影響，以進行對當前局勢的評估與未來趨勢的判斷，而主觀理解的傾向，則是造成認知與現狀偏離的主因（Rose, 1998: 167-168；Schweller, 1994: 72-107；Zakaria, 1992: 177-198；Wohlforth, 1993: 301-302；Friedberg, 1998: 280-284）。以菲律賓的南海作為觀察，阿基諾三世（Benigno Aquino III）的個人因素就是政策轉向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阿基諾是在菲國反貪腐氣氛下獲致政權，一方面國內政治依然掌握在少數具經濟、產業支配性的政治菁英家族手中，而這些家族的經濟利益多建構在國內基礎而非國際貿易之上；於是，為鞏固執政地位，借反腐運動清算前總統阿羅育（Gloria Macapagal-Arroyo）的政治勢力和影響，實踐對軍方提高軍費開支的承諾，維護菁英家族支配的平衡等因素（Kasuya,

² 現實主義認為，當既存體系的安全威脅來自於挑戰國家時，霸權國家的戰略回應選項就必須判斷對手國的意圖與行為，支配國際體系的霸權國家，會針對挑戰體系秩序與穩定的威脅國家，採取權力平衡或積極圍堵政策，以解構威脅國家的持續擴張，而其回應政策與態度選擇上雖然也是區分為：現狀政策（status quo）、修正政策（revisionist）與不確定狀態（uncertain or undecided）三種；然而霸權國家對此的反制或處理策略則分別是：結合、圍堵、或交往。至於在處理優先等級上，面對不滿現狀的修正國家，由於此等國家傾向於採取衝突與對抗的策略，尤其在諸如領土、邊界、種族、民族主義等問題上，多數選擇激進的回應方式，進而導致體系的不穩定性升高，因此為最優先對象；至於不確定狀態國家，則因有可能在未來轉變為現狀國家或修正國家，因此在處理強度與急迫性上，較為和緩；另外，現狀國家由於受益於霸權體系，因此對於現有結構與秩序不但滿意也存在維繫此一利益的強烈意圖，因此，相互結合、強化經濟與安全關係、維繫現有體系的穩定與和平即為核心選項。

2005: 523 ; Simbulan, 2007: 45-46 ; Pasadilla *and* Liao, 2005: 1-17 ;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 2010: 86) , 即成為促使其忽視對中國的貿易利益, 透過其美國背景尋求對抗中國的戰略操作。整體而言, 國家對外政策的核心, 是謀求最大程度的「國家利益」, 極大化本國的影響力, 而這種追求與國家的相對力量呈現出正相關的發展趨勢 (Zakaria, 1992: 194) 。而如此理解, 在解釋東協各國之間為何發展出一種缺乏強力、有效的執行機制, 制裁與遏止能力闕如的運作系統時, 事實上更具有深層的解釋能力。同樣的, 在中國崛起問題上, 也可以更清楚的說明, 北京在理解威脅與選擇回應戰略時的認知背景。

參、東南亞地緣戰略態勢的新古典現實主義觀察

東南亞地區幅員遼闊, 農業、林業和礦產資源甚為豐富 (劉咸嶽、黃錚主編, 2002: 16-17; 曹雲華, 2000a: 32; 季興國, 1994: 6) ,³ 另外地形、地貌複雜多樣, 並因山川、海洋而分割成「海洋東南亞」與「大陸東南亞」兩個不同的生活圈與文明區塊, 更在民族、語言、宗教與文化等各方面均呈現不同、複雜與多樣化的特殊面向, 然而這些不同面向, 卻又在歷史發展的交流與衝擊下, 各自向其他地理區塊滲透。近代以來, 更由於交通、資源等地緣政治因

³ 其中泰國、緬甸、越南稻米產量世界之冠; 橡膠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80%, 馬來西亞是世界上最大的橡膠生產國; 其他物產如棕櫚油、咖啡、椰子、煙草、香料等亦有重要地位; 在森林資源中, 盛產柚木、楠木、紫檀、鐵木、烏木等名貴木材; 印尼的熱帶雨林僅次於巴西, 其膠合板與藤條為世界最大的出口國; 礦產資源主要有錫、鎢、鋁、銅、鉻、鎳、煤、鐵、寶石等, 其中錫礦儲量占世界總儲量的60%; 印尼蘊藏油氣資源豐富, 不但是東南亞最大的石油生產國, 也是世界最大的天然氣出口國。

素，不斷的吸引域外強權的介入與爭奪。多元文化是事實，而摩擦也不斷發生，更嚴重的則是在文明衝突背後的強權地緣權力競逐（Islam, 1988: 442-443；吳俊才，1976；嚴智宏，2005：79-116；張奕善〔譯〕，1982：543-545）。地緣因素雖被視為國際政治分析中最穩定的因數（Parker, 1998: 18），但經常在實務運作過程中被輕易的忽視而不自知。例如，一般對強權支配的認知，總是以「當下」情況作為構思的基礎，但歷史經驗與地緣現實的影響，卻在大陸與海洋東南亞之間形成不同的思維架構與運作理路。對大陸東南亞而言，歷史上的安全威脅來自於兩個不同的面向，一是北方的中華帝國，一是區域內鄰接國家的挑戰；而海洋東南亞方面則包括來自於中國與西歐的海洋威脅，但在形式上卻又有著不同的切入點以及吊詭而相似的詮釋邏輯。這種地理的區隔使海洋東南亞受到較明顯的經濟、貿易因素影響；大陸東南亞則有較多的宗教與文化的激盪，但也都在不同區域內受到來自不同強權的政治影響，也因此，一般認為中國對大陸東南亞國家的影響力較大，而美國則對海洋東南亞國家的影響較大（Lum *et al.*, 2008: 79-81），但實際情況卻遠比這樣的歸納更為複雜，尤其在運用新古典現實主義來理解問題時，決策系統對國際權力關係與威脅的認知，取決於決策者的經驗與理解，因此，對於地緣條件的影響與理解，就不能僅止於一般泛泛的認識，而必須深入「長時間歷史與大範圍地理」的地緣知識建構之中，⁴ 以體會這些造成認知與現狀偏差的深層因素。

⁴ 地緣認知要強調的不僅只是地理因素，而更需同時理解在如此地理環境下形構的歷史發展趨勢以及影響，因此，不能單純以「地理決定論」來理解地緣，而是人在地理環境交互影響下，所形構的歷史地理概念。

一、地緣結構下的安全認知

基本上，東南亞的地緣結構形成資源的引力與強權介入的動能，而這樣的權力結構關係，則界定了東南亞國際關係發展的基礎，與其間的戰略決策以及威脅認知。其權力競逐的驅動力，展現在以經貿利益為主的海港與驛市，透過交通路線的聯結而向外輻射；透過內部安全的需求而對外吸收能量與引來干預；透過宗教、種族、文化的建構，在不同特定區域展開統合與爭戰，同時也因這些影響兼具有平撫衝突或惡化情勢的加乘效應。例如，印尼即認為漢武帝時期，中國勢力進入華南、西南等地，就是漢人擴張與殖民的證據，而中國所尋求的就是一種類似歐洲對外殖民的政策(Fairbanks, 1992: 61; Taylor, 1963: 166)。在地緣結構上，海洋東南亞環繞著南中國海零星分佈，而「南海」位居太平洋與印度洋的航運要衝，北經台灣海峽與東海相通，東經呂宋海峽與太平洋相連，西經麻六甲海峽直達印度洋，南出龍目海峽連接大洋洲，成為溝通亞、非、歐以及大洋洲之間海上航行的必經之地，航運之頻繁居世界之冠，更是許多國家重要的經濟命脈，故而在軍事觀點上，從西太平洋向印度洋、波斯灣的武力投射，就以上述各海峽為軍事「扼制點」(chokepoints) (Sokolsky *et al.*, 2000: 10-14; Khalilzad *et al.*, 2001: 35, 163; 王正毅, 1997: 27)，作為強權軍事存在的核心。就戰略形勢而言，此地為中國「鎖鑰之地」，係東出太平洋、南入印度洋的咽喉，不但天然資源豐富，而且在國防與經濟上都具有重要戰略價值(劉志青, 2011)。相同的，大陸東南亞鄰接亞洲大陸，山脈多呈南北走向，沿海的河流沖積平原糧食生產豐富、人口稠密、經濟發展較佳，但邊疆地區則多數居民較為窮困，但重要的戰略性礦產卻都在此境內，至使邊區社會普遍存在相對剝奪、不受重視的感受。另外在殖民分割的歷史過程中，邊區山地民族經常被劃分隸屬不同國家，也

形成嚴重的跨國界民族問題，由於區域內跨國界民族甚多，加上各個國家發展的程度落差甚大，尤其當國家的非主體民族利益受損時，就會寄望於由其本族人民所組成的外部祖國給予支持，如泰國南部的馬來人就會求助於以馬來人佔主體的馬來西亞力量；緬甸境內的克倫族獨立運動背後則有泰國的支持等等。至於在安全議題上，山地的安全戰略位置，經常是阻止亞洲大陸入侵的重要關鍵，但少數民族問題則成為另一個安全顧忌，也因此在大陸東南亞各國，引發不同程度的問題。

二、衝突型態與戰略回應的發展

整體來說，後冷戰時期的亞太戰略結構，主要還是受中美日三角權力關係所影響（Emmers, 2003: 112）。就東協的一般認知而言，美國普遍被視為溫和的超強，日本則為合作的夥伴，至於中國則為不確定的崛起中巨人（曹雲華，2003：15-19）。面對此議題，基本上需觀察，各國內部的國家利益認知、政治勢力競逐、統治正當性的建構與維繫等因素（Rose, 1998: 144-172）。對東協回應的理解，需就影響區域整合的地緣因素來分析，東南亞地緣衝突呈現出長期延續的安全競爭兩難，例如東協的架構安排，即是在冷戰結構下，出於各國為特定安全或經濟目的而建構的一種內向型、排外性的建制，相對於 21 世紀的外向型、非排他多元功能的複合型組織需求，就呈現出相當的結構性困境（Buszynski, 1997: 555）。若就決策內涵來看，除了權力結構的影響外，東南亞歷史與地緣條件所形構的認知底蘊，以及各國內部的權力分配（或支配）狀態，則是上述戰略競合狀況的根本影響。

（一）國內層次的影響因素與戰略回應

就東南亞內部因素引發的結構性政治衝突來看，可以區分為以

下幾個層面，來分析地緣結構對決策認知的影響範圍與深度。

首先，殖民歷史經驗在東南亞各國的威脅認知建構上，佔有甚為重要的地位，由於西方勢力介入東南亞的首要目標在貿易利益，因此在統治行為上，分而治之的策略是首選，以英國統治為例，直接、間接、混合式統治的操作，加上各族群因習俗、生活方式之迥異，教育與文化之不同，致使各族裔之間缺乏溝通管道，而形成認知的定型（stereo-type）與局限。於是，馬來人被認為疏懶，穆斯林被貼上落後，印度人被視為狡滑，華人被視為高傲等等，透過這種「刻板印象」的建構，非我族類的對立就很難化解，分離運動的驅力，也透過這種歷史認知和政治操作，相互作用而持續不斷（Geertz, 1973: 258；洪鎌德，1995：25-26、29；顧長永，2005：1-26）。這也形成東協各國在內部資源分配過程當中，其特定的操作取向，同時也是跨界種族問題惡化的條件與社會穩定性破壞的因素。其次是有關於政治體制問題，而此問題係更加重區域內部政治情勢的不安的重要關鍵，冷戰時期所遺留的「官僚威權主義」（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在東南亞普遍存在，社會統治菁英藉由對特定部門的壟斷，透過嚴密操控維持社會秩序，藉特權獲取利益（Dahl, 1991；Donnell, 1979: 286-302）。以菲律賓的政治與經濟為例，其內部菁英家族為國家實質的控制者，透過「恩從關係」（patron-client）、「競租關係」（rent-seeking）取得軍方及朋黨支持，壟斷國家資源，再加上社會文化的「人情主義」、「形式主義」，在寡頭民主運作下，貪腐形勢加劇，致使社會動盪、行政腐化、公權力不彰（Kang, 2002: 39-41；Coronel, 2001: 5-9；Buendia, 1993: 157-159；顧長永，2005：69）。也因此，東協組織在對外問題上所呈現的一致性，並非以組織整體為首要，雖然強調東協區域自主，但尋求成員國自身戰略利益與需要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才是各國關切的核心，這也使成員國之間的矛盾與對立時常出現，其中主要的因素係來自於各

國內部政權正當性與穩定的考慮，進而很難形成妥協與共識，使得東協整合始終僅只是未來憧憬（Nischalke, 2000: 95；Chanda, 1986: 348-349；Narine, 2004: 423-450；Antolik, 1990: 142）。雖然東協試圖透過各會員國間的相互阻怯、牽制、合作等方式來解決衝突，但在面對複雜國際權力衝突問題時，卻經常會陷入冗長無效率的政治攻防，而無力處理緊急、重大問題的困境（Djiwandono, 1988: 283；Olson, 1965: 2；Naya and Plumer, 1997: 119）。

就威脅認知取向的影響而言，當北京將戰略重點轉向亞洲，中國的「韜光養晦」固然有利於區域經濟發展，但「中國威脅」則隱含著東協最深刻的憂慮（鄭永年，2009），在沒有足夠、有效的籌碼以為因應之時，引入美日勢力平衡中國的影響、提供安全保障，就成為重要但又兩難的操作模式。而同樣在這個問題上，還可以發現區域內長期存在的宗教與文化衝突，多元化與多樣性特徵中，儒教文化影響在相當程度上，使經濟的發展成為合理化威權主義的關鍵（李文，2003：112）。拉攏中國發展經濟就變成必須，而同時也促使東協發展出引入其他的域外強權，以圖平衡中國威脅的認知與行為。另外，由於各國的國家認同建構粗糙、社會貧富差距、族群疏離、宗教極端等問題，以及非傳統安全威脅與恐怖攻擊，均使東南亞內部整合發生結構性缺陷（Cheng, 2003: 83-126；肖歡容，2003：8）。尤其種族與區域間的經濟差距更阻撓互信的建構，當發生經濟差異擴大之時，衝突即隨著種族差異的意識而擴大，更透過不信任感，引發認同與政治效忠的疑慮（Leo, 1997: 16-17；姚楠〔譯〕，1987：205；李元謹，2002：48）。也使得宗教極端勢力與分離主義活動，因此找到滋長、發展的溫床（Schwarz, 1994；Chalk, 2005: 19）。進而影響國際行為的轉換，例如印尼前總統梅加瓦蒂（Megawati Sukarnoputri），在面對九一一事件的態度是譴責恐怖主義，但也反對伊拉克戰爭，刻意與反恐戰爭保持距離，而其決策作為的核心考

量，就在於國內穆斯林的反應，避免在國內可能會被解釋為屈從美國（Sukma, 2004: 86）。這些部分則加劇各國在戰略決策過程中，各自盤算的複雜程度，而在實踐過程中，反應出單純以國際權力結構來分析東南亞問題時，容易產生的偏離。

（二）外部強權因素下的認知影響

首先，與結構現實主義的理解相同的是，地緣因素提供了強權可以介入東南亞的空間，此問題又分為地緣利益與東協機制所導致的吸引力。就地理環境來說，交通、能源、海洋貿易是吸引強權為維護其戰略利益與拓展影響力，而積極參與東南亞事務的重大誘因。其次是，當東南亞各國脫離殖民列強的支配之後，列強的經濟控制事實並未消失，透過新的特殊合作關係、組織與制度，使得原殖民母國的特權壟斷與控制，以變異的形式持續存在（岡倉古志郎，1967：17-18）。而東協國家在各自利益考量下，很難形成整體的力量與之對抗，更難以擺脫大國的影響，於是中國即成為其政策回應的選項。此其間的弔詭則表現在：即便瞭解中國係利用東協組織中，新、舊會員之間的經濟差異，來操作拉攏支持的作為；即便認知到雙方在國際市場上產品的競爭性高、互補性不足等事實；即便知悉中國很可能希望藉排擠美國，以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在東南亞推行「中國式的門羅主義」等可能，但東協各國卻依然熱衷與中國籌組自由貿易區（Kurlantzick, 2006: 273; Liu, 2008: 6-7; 沈紅芳, 2009：12-19；經濟部國貿局，2010）。而這其中最關鍵的認知則在於，東協試圖透過建構東協模式的區域整合，取代過去的大國支配，以提升協商籌碼與影響力（Cossa, 2007: 8）。接下來就權力的相對性與統治經驗所形構的認知來看，冷戰結束之後，美國與蘇聯相繼退出權力競逐場域，其中的「權力真空」就提供中國填補的空間，而中國崛起在亞洲確實觸發國際政治權力平衡的轉變，東南亞成為中國

的核心利益區，也被視為中國影響力投射，最有可能、最具成效且接受度最高的地區，而如此國際情勢的發展，也將促進北京的利益追求與影響提升，同時也對東協諸國形成直接的壓力（Kristof, 1993: 59-74；Vaughn and Morrison, 2006: 1-2）。故而，當中國崛起的因素加入長期衝突的架構之中，歷史上不愉快經驗即引發嚴重的憂慮，過去將華人視為「忠於中國的顛覆分子」的認知（黃朝翰，1990：86, 88），⁵ 以及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革命輸出」的陰影，更加強東協成員國在安全認知上對中國的疑懼（王繩祖主編，1995：249）。尤其中國將主權問題視為「最為敏感的部分」，而表現出絕不退讓的態度（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4：854），⁶ 更使東協對中國的憂慮，即便在雙方均已開啓對話管道之後，依然無法抹滅（Glosny, 2006: 25）。如此也形構東協各國在安全認知上，最深層的威脅憂慮。

就歷史發展的過程來看，東協的存在與影響力，本質上是國際權力政治與強權之間妥協與默許的結果。1969 年「關島主義」（the Guam Doctrine）提出，呈現出美國霸權衰退與逐步退出亞洲的端倪（Laird, 1972: 3）。東協的成立，係為因應地區各國內部對「安全」的需求，以及面對外部強權的優勢力量，企圖加強與大國「討價還價」的整體能力（Acharya, 2001: 86）。但畢竟，東協國家多為小國，無法僅依賴各自身的力量保障區域安全，故希望逐步建構、操作所謂的大國平衡戰略架構，利用大國之間的利益衝突相互制

⁵ 早在 1970 年代，馬來西亞總理東姑拉曼（Tunku Abdul Rahman）即曾公開指出，中國的外交政策是「擴張與冒險」，其目的在於完成它意識形態上的聖戰，其唯一的目標和宗旨就是試圖用武力來推翻馬國政府。

⁶ 歷史經驗上，當主權問題涉及政治、領土及外交問題時，該等問題立刻觸及中國最為敏感的部分，誠如 1982 年 9 月 24 日鄧小平會見柴契爾夫人時指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約，形成一種平衡狀態，以維持地區和平與穩定。然而，操作權力平衡需要具備支配資源的實力，國際政治的現實面一向是大國之間的「交易」，而這種交易又多數是以犧牲小國為代價，這也是東南亞整合過程中，另一個潛在的危機，更是東協國家在戰略操作上的重大盲點。相對於域外強權國家而言，東協諸國的脆弱性與依賴性顯而易見。東南亞的地緣政治特點，可被詮釋為一個「區域外大國具有特殊利益，並相互為其影響力而競爭的地區」(Bert, 2003: 143)，雖然說，單純依賴並不能保證國家利益與區域戰略利益的實踐，但東南亞在歷史上，經常只能是國際體系中的次級區域，很難抗拒強權的影響，而必須「選邊站」。對於強權國家而言，此區域係一個內部多樣性複雜，利益追求各異，整合鬆散的區域；而東協則只是個缺乏自我保護與捍衛自主權實力的機制 (Collins, 2000: 2)。由以上分析來理解，東南亞戰略環境的建構，不僅是結構現實主義所強調的國際權力結構的影響，更是東南亞長期與特定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形構的安全認知與國內政治結構的多重影響，而這樣的多重影響，相對也預告了各方戰略選擇過程中的多重困局。

肆、美國的海洋秩序建構與重返亞洲的安排

「海洋秩序」是一種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持續演進與變化的思維與認知、操作途徑。本質上，係霸權國家為延續其霸權支配所形構的一系列地緣政治與地緣戰略的操作規範，作為建構在資本主義體系之下，而確保國家利益的重要關鍵。當前美國的海洋秩序安排，係以海權運作為核心「硬核」建構三種關鍵的連結機制，以維繫海權存在與持續發展的機制。包括第一部分「意識形態的建構」，由美國傳統基督新教信仰為出發，透過民主、人權的結合，宣傳諸如民主和平，開放教育體系與資源，以及強勢的美國媒體與通俗文化

等綜合組成。而第二部分是「政經制度的建立」，透過制度的連結，操作國際政經組織（如世界銀行、聯合國等）在不同領域之中的約束與導引，以軍事、經濟援助，改變政治、經濟體制，建構國際交往與運作關係，形構政治、經濟、貿易、工商業等全面性認同與實踐，提高可預測性與可操作性。另第三部分則是建構「霸權支配系統」，透過國際機制諸如聯合國、區域政經組織（亞太經合會、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東協等等）、雙邊或多邊條約（諸如美日安保條約、美澳紐公約、美韓協防條約等）建立安全議題或甚經貿、社會、環保、衛生等領域中，美國的領導地位與資源分配權力。以上三部分共同組合成一種持續增加美國海權實力，形成資源吸收效應，並以海權為中心，向敵對挑戰國家採取諸如艦砲外交、圍堵、緩和、擴大與交往的壓制手段，以確保美國霸權的持續（何耀光，2008：472-474）。而這樣的海洋秩序設定與權力支配操作，則是美國雖然在面對相對國力滑落與中國崛起之際，依然能透過此三個支柱，保持具體而靈活的體系運作能力、維持體系支配地位的重要原因。

理解這樣的秩序安排可以發現，其實美國勢力從未完全撤出東亞，即使在冷戰結束之初，美國在東亞的軍力銳減，但「美軍存在」卻一直是個事實。後冷戰時期美國的亞太戰略安排核心在於：降低戰爭風險、維持安全的可控制性，深化全球化條件下的市場經濟效能（Moore, 2001: 170-179）。因此，在南海問題上，美國的基本立場還圍繞在 1995 年國務院「南海聲明」中「維護航行自由」的主軸上（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95）。而美國的軍事存在則是維持航行自由與領土糾紛的和平解決的關鍵重點因素，透過展現承擔和平的責任以穩定盟友信心（Awanohara, 1992: 18；Eikmeier, 1998: 3）。2009 年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R. Clinton）宣稱「美國已重返東南亞」，2011 年進一步指出，美國須在戰略上轉向亞洲，大

幅增加對亞太地區外交、經濟、戰略和其他方面的關注（Clinton, 2009；Clinton, 2011）。其實，所謂的「重返亞洲」只是美國在亞洲布局的調整，整體而言，雖然在國力消長狀態下，東南亞權力競逐態勢有明顯的變化，但美國自二戰以來的海洋秩序運作基礎卻尚未崩壞，華盛頓方面係明確的認知到美國實力下滑的威脅感，而在戰略因應上，重新調整同盟關係的鞏固、與戰略對手國的協調、以及試圖在危機管理與次要權力競逐者的爭取等方面，積極佈署與操作。

隨著戰略重心的轉移，南海問題也就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關注。其重要性，則可由發言官員的層級甚至高到國防部長、國務卿之列，即可見這樣的衝突對美國在東南亞的行動的重要性（Simon, 2012: 1002），也成為東協國家在南海利益上試圖拉攏美國的因素。對美國海軍而言，其作戰指導與海上戰略亦已隨之修正，除強調海上基地的概念外，更針對海上航行自由的部分，宣示美國海軍將根據國際法，排除任何非法的限制（U.S. Department of the Navy, 2010: 22）。中國崛起的影響已逐步擴大並超越了單純的經濟問題，對華盛頓而言，中國國內的「過度自信」已經在朝鮮半島、南海、東海爭議問題上，展現出對周邊國家的「強制外交」傾向，更在實質上挑戰美國在東亞地區的聲望、利益和霸權（Zhu, 2012: 18-37）。於是歐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在 2010 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列為「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更在 2011 年 11 月宣佈「亞太再平衡戰略」，美國關切的核心係在於，軍力日益增強的中國，在爭議海域中，以更強勢的方式提出主權要求，將對美國的航行自由與兵力投射構成威脅（Manyin *et al.*, 2012: 2）。而在運作上，再平衡策略以促進地區穩定為目標，強調國際法的尊重、市場機制的實踐、南海的航行自由。至於島礁的主權聲索與要求，美國則維持傳統的中立態度，並鼓勵各方以外交協商來處理爭端（U. 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2）。在戰略部署的調整上，「再平

衡」戰略的具體安排包括，預計在 2020 年時，太平洋與大西洋的兵力部署比例，將從目前的 5:5 提高到 6:4，並將包括六艘航空母艦、大多數巡洋艦、驅逐艦、巡防艦與潛艦陸續部署於亞太地區。對太平洋艦隊的水面艦隻進行性能提升，洛杉磯級攻擊潛艦部署於關島、提升新加坡樟宜基地的戰略等級部署常駐艦艇等等（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2；Preston, 2013: 5）。透過軍事部署的調整，華盛頓所展現的「前緣部署外交」（forward-deployed diplomacy）係透過加強雙邊安全同盟、擴大與新興國家（包括中國）的夥伴關係、參與地區多邊制度、擴大貿易投資、鞏固軍事存在、促進民主與人權等六個行動軸線（lines of action）來展開（Clinton, 2011）。

再平衡戰略不僅是針對中國的戰略調整，一方面警告、阻止中國可能對亞太穩定現狀的破壞，同時也向盟國傳遞美國才是制衡、穩定亞太權力結構最值得信賴的一方，更能在危機與衝突時成為安全的保障者（security guarantor），進而取得干涉、介入區域事務的支點（Clinton, 2013；Thakur, 2013）。於是，當南海問題被界定為美國的國家利益之後，在當年 10 月，東協即正式邀請美國參加第六屆東亞高峰會議（East Asia Summit, EAS），更為美國積極欲將此高峰會議，發展成具備「解決或避免爭端的基礎性區域政治安全機制」的意圖，奠定實踐的基礎（Acharya, 2010）。進一步使東亞政治合作擴大成泛東亞對話，並藉「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的談判，構建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平台。然而這樣的戰略轉變並不能視為新一波冷戰的序幕，畢竟，華盛頓方面相當清楚，一味將中國視為不安全的根源，只會導致亞太地區秩序的災禍，過度強調軍事安全，相當程度上也將刺激中國在安全問題上的敏感神經，進一步鼓動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結（White, 2012: 5；Ross, 2012: 70-82）。如何能形構中美之間產生「各自的戰略疆界」（strategic boundaries）的穩定效果，

基本上是在中國崛起現實之下的戰略思考（Ross, 2010: 225-245），畢竟，「中美關係的未來，衝突是一種選項，但不一定是必須」（Kissinger, 2012: 44-55）而美國官方也認為北京與華盛頓之間應在傳統的崛起強權與霸權關係認知外，尋求新的理解與答案（Clinton, 2012）。當然，這樣的形式也持續默許著東協國家，保持自 1990 年代以來，避免在中美衝突中「選邊」的戰略發展（Denmark *et al.*, 2013: 1-44）。整體而言，再平衡戰略在亞太市場上確有掌聲，也受到一定的歡迎，雖然在釣魚臺問題上安倍晉三（Abe Shinzo）的作為，曾使美國陷入尷尬和棘手的情境（Barnes, 2013），筆者認為，如此情勢發展恰也明確的對外界釋放出，美國在東亞問題上，有著不可忽視之意願與能力的印象。

伍、中國崛起的戰略操作與限制

中國崛起係上世紀末以來，國際關係學界所注意的重要焦點之一。「中國威脅論」主要憂慮來自於中國在軍事、經濟、生態、意識形態與文明等各個範疇的威脅認知。其中在直接的軍事威脅包括：軍費與軍備的高速增長、透明度欠缺、軍備競賽的趨勢、權力真空的填補、周邊海域領土爭議、核子技術的發展與擴散等等。至於經濟威脅方面則包括對中國經濟將成為世界第一的憂慮、對中華經濟圈的形成與擴張的預估、對國際市場與國際資金的爭奪、低價傾銷的產品與因此導致的失業危機等等。甚至對生態威脅方面則有，資源、能源消耗而帶來嚴重的環境問題；溫室氣體排放對全球暖化、氣候反常的影響；因人口增加導致的糧食危機等等。另外則是「非民主」國家的必然威脅邏輯，以及儒家與伊斯蘭文明擴張形成的「文明衝突」（Bernstein *and* Munro, 1997b: 25；Chanda, 1995: 24-28；Kristof, 1993: 59-74；Brzezinski, 1997；Segal, 1988: 231；

Conable and Lampton, 1992: 142; Applebaum, 1995: 10-12; Huntington, 1993: 22-49; 孫英春等〔譯〕, 1998: 5; 楊達洲〔譯〕, 1996: 20-22; 蔚文〔譯〕, 1996: 10-11; 曹鳳中、馬登奇主編, 1998: 9-32; 張小明, 1997: 40-44)。當然, 中國崛起係現存的事實, 在龐大人口、快速經濟發展、高度能源需求、軍事力量強化、國際影響力日增的狀況下, 很難不被視為一種「威脅」, 但如此的威脅是一種「真實」, 抑或是一種建構的「假象」呢? 即便最傾向現實主義觀點的人來看, 中國雖有崛起的現實, 但依然面對著諸如政治穩定、經濟增長、區域合作、能源生態問題、周邊國家信賴等等嚴重的問題難以解決(郭武平等, 2006: 201; 門洪華, 2003: 83-89)。因此, 對於中國崛起所形成的挑戰, 在理解上則可以由中國威脅認知的多元性、中國對外部認知的回應、回應模式的變化、國內外因素形構的戰略選擇與戰略操作的限制等方向來觀察其未來發展的前景。

一、中國崛起的強權認知與相對的回應

崛起的中國因改革開放的經濟利益, 在實質上與感知上牽動著國際的關切, 然而崛起卻伴隨著必將對抗的陰影(Kugler and Tammen, 2004; Lemke and Tammen, 2003: 269-271; Casetti, 2003: 661-675)。而如此的理解則源自於美國國力的衰退, 以及衍生的權力平衡與區域秩序轉換可能, 尤其現實主義論者, 基本上相信中美之間的兩極平衡可能性正逐漸降低, 美國已無法單方面掌控戰略全局, 而僅具備「離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的制衡作用(Betts, 1993: 34-77; Kupchan, 2002: 247-303; Kupchan, 1998: 42-43; Joffe, 1995: 94-117; Khalilzad *et al.*, 2001: xiii, xiv)。就其觀點而言, 崛起國家具有擴張的本性, 而「崛起大國挑戰現有霸權」的企圖, 即造成國際體系動盪, 將導致週期性全球戰爭的爆發(Wight, 1978; Gilpin, 1981; Mearsheimer, 2001a)。就北京方面的理解來看, 相對

於美國勢力的消退，在中國周邊的國家普遍面臨著如何在美中之間維持戰略平衡的問題，選擇繼續依賴美國者（如日本）多數選擇疏遠中國，而其他國家的典型態度是，對中國釋出善意，發展睦鄰關係，並同時保持與美國的友好關係（王緝思，2005：15）。但畢竟，美國在距離、資源與介入正當性方面，有著戰略布局的困難，尤其在面對東南亞各國都存在著地緣戰略的重要性，對豐富天然資源的迫切性，以及發展能源短缺的形勢時，華盛頓方面現有的戰略工具與選擇，並不足以應付立即性突發狀況（Gallagher, 1994: 169-194；曹雲華，2000b：16-18）。尤其在「權力梯度耗損」（Loss of Strength Gradient）的地緣戰略事實下，霸權影響力的強度將隨著距離而呈現衰減的狀態（Boulding, 1963: 230-232；Buzan, 1986: 3-33）。而在中國，面對內、外部有利的形式下，大約自 2003 年開始，北京便試圖倡導東亞地區主義，建構新興政治機制，欲將美國排斥在東亞共同體之外，如此更促使美國認真思考東亞出現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集團之可能性（Ikenberry and Mastanduno, 2006；Rozman, 2006: 168；Medeiros and Fravel, 2003: 22-35）。也因此，使美國對中國崛起的事實，採取了更加警覺、積極回應的態度。

理論上，這種透過經濟的快速增長與積極的外交活動，確實有機會使其權力與影響，在未來的幾十年內增強到美國難以處理的地步（Ikenberry, 2008: 23-37）。對於華盛頓來說，縱然中國的軍事力量在短期內無法與美國抗衡，但若透過地理位置與先進科技設備的組合，依然可以形成嚴重的困擾，並在東亞地區形成對安全的嚴重挑戰（Christensen, 2001: 7）。2008 年 12 月，中國編組海軍艦隊赴亞丁灣打擊海盜，雖然北京認為該行動僅是對海上石油線安全的確保，也是顯示國際義務實踐的決心；但如是行動，卻使華盛頓意識到中國海軍的信心與能力的提升，以及對美國與盟邦的可能威脅，美中在傳統安全領域的競逐態勢亦逐漸明朗。事實上，就美國的理

解而言，中國崛起可能引發強權競逐的認知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是中國的歷史經驗，使其對復興輝煌歷史、再創「華夏秩序」支配的欲望與企圖持續提升。另一方面源於國際政治的「霍布斯恐懼」（Hobbesian fear）與權力轉移的理論認知：新興強國會以一切手段來競逐權力、增加國力，以確保安全、避免遭受他國的迫害（Herz, 1959: 235；Swaine and Tellis, 2000: 197-218）。於是，中國軍力的增長即被視為對當前國際體系與亞太秩序的嚴重挑戰，即使中國融入國際體系、努力建構和平環境，但龐大而現代化的軍隊，亦為亞洲權力平衡趨向不穩定的變項（Hoehn *et al.*, 2007）。對美國而言，「區域外國家」的客觀事實，使得華盛頓在「介入」問題上，很難發展出國際政治上的正當性；再加上東協各國境內宗教、種族、族群的矛盾，使各國內部和諧與穩定成為高度政治敏感的問題，相對也使各國在處理南海問題上，多加了內部政治穩定與否的思考，也嚴重的影響到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安全、經濟與戰略利益的佈局（Dillon, 2004: 1-5；Lohman, 2007；Rabasa, 2001: 4-10）。整體而言，當前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惡化的情況，恰正提供美國重新介入東亞的機會，也為美國的「亞太再平衡」建構正當性。然就北京的認知而言，再平衡戰略根本就是針對中國的圍堵安排，亦為導致雙邊關係更趨緊張的主因；隨著美國在釣魚島與南海爭端的表態，這些疑慮已逐漸證實（He, 2013），面對此狀況，新一輪軍備競賽似乎已在所難免。

二、中國的戰略選項、操作與限制

中國的國際戰略認知約於 1982 年開始有明顯的調整，由原先長期關注的政治、軍事安全，逐漸向經濟安全議題轉向，政治、軍事的地位雖然相對下降，但核心安全領域依然是中國安全觀的重心（秦亞青，2003：10-15）。自 1980 年代以來「經濟建設」的迫切

性一直是中國對外政策的核心，「尋求和平的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化」（鄧小平，1993：104）係最高指導原則，因此，中國極力主張其國力與國際地位的提升，會承擔負責任大國的使命（門洪華，2005：288-293）。事實上，也就在改革開放的策略認知下，透過江澤民的南巡定調，北京決策當局開始認知到「負責任大國」形象確立的建構效果，中南海方面確知其必須在經濟、政治等各方面在國際間扮演關鍵性角色，提供有效公共財。因而在實踐上，尤其在兩次的金融危機中，北京在援助或對抗人民幣升值等等問題上，確實表現出負責任大國的態度與作為。另外，在朝鮮半島核子危機問題上，中國透過「六方會談」機制，以及北韓對中國的依賴等機會，確曾在東北亞區域穩定問題上，發揮關鍵作用並成為美國合作的對象（Hill, 2005）。另外自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起，無論雙邊貿易談判、參與多邊組織、在東亞地區進行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國際人道救援與援助（Humanitarian Assistance）等議題上，均顯示其改善周邊環境的強烈意圖（Shambaugh, 2004: 64-99）。對外部威脅與機會的認知如此，即促使北京積極尋求與東南亞國家建立緊密關係，以避免中國威脅論的負面影響，相當程度上也成功的削弱了東協在處理南海問題上的團結一致立場。

雖然說中國崛起在北京以睦鄰為核心的涉外原則操作下，至今並未顛覆東亞安全秩序的運作，透過雙邊同盟、多邊對話與特殊外交的混合，既沒出現軍事競爭對抗，也沒挑戰、撼動到美國的權力平衡安排（Ikenberry and Tsuchiyama, 2002: 69-94）。然而，當既存的權力結構安排與核心利益相互衝突時，合作與維持現狀的自制能力將會受挫（Johnston, 2003: 5-56），而在核心議題上，中南海方面相信「在防止東南亞地區為敵對勢力所左右的基礎上，謀求更廣泛

的合作」(唐世平, 2000: 44) 係國家獨立自主的重要議題, 也是穩定國內政治正當性的重要指標。再加上, 其對戰略情勢的理解, 認為全球反恐戰爭已使美國在阿富汗、中亞、巴基斯坦、俄羅斯重新建構戰略合作關係, 也對中國形成戰略包圍的態勢 (strategic encirclement), 更使美國在亞洲的地緣政治優勢更加穩固。相對中國則在周邊海域問題上面臨嚴重的戰略困境, 其中包括: (1) 國家主權、海洋權益維護與東協關係發展的兩難; (2) 中日海洋爭端日趨嚴重, 東、南兩線同時面對惡化中的環境; (3) 經濟、社會發展, 急需保持周邊的穩定, 亦使得戰略選項被壓縮 (傅夢孜, 2003: 17-22; 劉中民, 2008: 77-78)。於是在安全威脅的理解上, 南海周邊國家聯合對付中國的意圖與問題的國際化趨勢已愈來愈加明顯 (侯松齡, 2000: 65-69)。另外, 在台灣問題的認知上, 就北京而言, 在台灣問題的退讓所可能造成的傷害, 將遠超過與美國的衝突 (Swaine, 2004: 39-49)。更重要的是自 1993 年中國成為淨能源進口國之後, 能源安全成為當務之急, 無論打擊分裂、極端與恐怖主義, 東北振興, 東協加一, 中非、中阿合作論壇等等, 均為北京方面以能源安全為核心戰略邏輯下的安排與嘗試。畢竟對中國而言, 天然資源的進口與生產貨物的出口, 係維持兩位數經濟成長的必須, 對於南海航道的依賴也因此無可替代 (Storey, 2007: 7; 肖佳靈, 2008: 1-15)。

因此, 北京方面更不能接受由美、日主導的東南亞安全機制 (Emmers, 2003: 116-117)。事實上, 隨著經濟不斷發展與對外聯繫日益密切, 北京的利益範圍也逐漸向外擴展, 中國軍方的地緣認知亦發生變化, 強調戰略邊疆的確立, 以維護利益與安全, 將國力、影響力超越國界向外延伸, 並將其戰略邊疆作為國家戰略思維、地緣戰略觀念與國家實力之結合與體現。於是擴大安全防範外徑, 處理境外危機及安全事態的能力就成為必須, 相對的, 左右世界局勢

的能力即成為解放軍重要的戰略認知（程廣中，1999：221）。因此，觀察北京與東協在 2011 年 7 月 20 日達成《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執行指南》（The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f Conduct）的協議，以及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第十屆「中國－東盟博覽會」中，強調南海爭議不應影響雙邊合作等言論（ASEAN, 2011；國務院辦公廳，2013），均顯示出中國方面急於顯示其正逐步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意圖與善意，並藉以暫時緩和南方的壓力、避免兩面作戰，以處理諸如釣魚臺等其他更加急切的問題。2013 年 4 月，中國發布的國防白皮書中將「維護海洋權益」視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空間和資源保障」，不但關係人民福祉，更關乎國家未來（國務院辦公廳，2013a）。在當前北京在南海戰略的實踐上，採用方式包括：海軍力量的增強與海權控制手段的多元；在法律層面強化海域的管轄，透過國內法的修正與國際法的詮釋賦予其尋求海上行為的「合法性」；不排除使用武力確保島嶼海域的管轄權等（古森義久，2011）。對北京而言，睦鄰政策依然是國家發展的核心策略，但對於周邊國家的領土野心，也必須以更加強硬的方式表達訴求。2009 年以來，中國開始將東海與南海的領土主權問題視為涉及核心利益的嚴肅問題，並進行強力的回應（Wu, 2012: 393）。畢竟，海洋議題在中國的長遠發展上，已逐漸成為國家生存的底線，且在本質上沒有談判的空間，而必須全力維護與堅決主張。

陸、東協在回應中國威脅時的戰略運作與侷限

1990 年代以後，東協與中國之間雖逐步建構起對話互動的正式外交關係，但卻未能削減東協對於中國崛起的擔心（Glosny, 2006: 25）。面對中國的國力發展，危機感逐漸提升，而東南亞國家更由於在歷史、領土、意識形態以及與中國的利益衝突等等因素下，對

於「中國威脅」的反應更加敏感，尤其菲律賓與越南更因為南海爭議，而將中國的海洋發展狀況視為嚴重的威脅（Yee and Storey, 2002: 250-283）。1995 年美濟礁事件爆發後，菲律賓前總統羅慕斯（Fidel Valdez Ramos）即稱：中國是東亞地區的首要威脅。雖然，北京不斷傳遞、強調其「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外交政策，但對於東協國家來說，存在的威脅感並未因此消失。這也促使江澤民在 1997 年中國與東協非正式高峰會議時，曾提出「增強信任，擴大共同點，求同存異，妥善解決分歧，確保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的政策宣示（江澤民，1997）。1998 年《中國的國防》則再次強調：「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國際安全形勢總體上繼續趨向緩和，但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然是威脅世界和平與穩定的主要根源，要爭取持久和平，必須摒棄冷戰思維，培育新型的安全觀念，尋求維護和平的新方式。」（趙崇明，1999：4）然而，對東協各國而言，其所面對的卻是一系列嚴肅的內外部挑戰與相對不足的國家實力。對於這些挑戰的理解則可以由安全認知的建構、安全威脅的強化、處理威脅的思考、國內層次與國際結構的聯繫、戰略選擇的邏輯等方面入手，進而觀察其未來發展的前景。筆者將此歸類為：地緣戰略與資源的爭奪、組織結構的缺陷、經濟發展的必須與內部安全維繫的需求等等項次來分析東協所面對的競合與挑戰。

一、背景條件、戰略標的與企圖

對東協而言，區域內的戰略與資源利益，係吸引域外強權介入的客觀條件，各國為維持其經濟成長，無可避免的對能源、資源的需求有無可替代的依賴。以區域而言，中國、日本與印度等能源需求大國相互競逐更增加了相互間緊張氣氛。其他強權為了維護其戰略利益與影響力的擴大，亦積極參與亞洲事務，而東南亞地區除了印尼、汶萊等地的能源供應、海上的石油運輸線之外，南海、東海

可能的原油蘊藏，均使得能源問題越形複雜（Len, 2007: 158）。而東協組織內部與各國國內因素的影響，亦為吸引強權介入的重要因素。歷史經驗上，東南亞除了長期以來受到域外強權的政經影響，甚至殖民等不愉快經驗，更在二戰之後，長期受到超級強國的戰略支配，成為美蘇在不同時期中圍堵中國的重要地區（McCloud, 1986: 179）。然而在中國崛起與地理鄰接的事實下，面對後冷戰時期中、美、日三大強權勢力在東亞的相互約制情況，恰正提供東協可能的操作空間（張錫鎮，2008：20）。也由此，可以發現不單僅只是權力結構所引發的強權介入，更因為東協在國內層次與威脅認知的因素上，加深了權力結構的影響效應。

理論上，在國際權力結構鬆動時，相對權力增加的國家，其國際行為與外交活動的企圖也因此隨之增加，至於，權力消退者，其影響力與意願則相對減少（Rose, 1998: 167）。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權力結構，實質上提供東協、中國等權力競逐參與者更寬廣的運作空間。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東協國家基於對西方國家、日本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失望與不滿，開始以務實的合作態度積極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取代過去的相互對抗，期藉共同的危機意識與歷史背景，催化東協各國的經濟合作與區域整合，諸如自由貿易區、東協加三、東亞高峰會、東協共同體（ASEAN Community）等機制的提出與實踐，目的就在建構談判的有利地位（Besson, 2003: 254-268; Kraft, 2000: 153-172; Ravenhill, 1995: 850-866; Cheng, 2005: 102）。由於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間的經貿關係有相當程度的互補性，東協各國透過天然資源輸出，換取其經濟發展所急需的資金和外匯；中國則提供規模龐大的市場與資金、技術等，在經濟各領域間進行廣泛的合作（李曉偉，2008：69）。然而東協國家係以經濟獲利為核心思維，對崛起中國的疑慮並未因經貿關係發展而削減，但因國家經濟發展，將可帶來成員國內部社會穩定、政權穩固、國力

增強等優點，故其基本戰略思維係以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等綜合性安全為核心，藉以「維護政權安全」（Snyder, 1999: 113）。整體來說，東協的戰略邏輯係一種平衡威脅與相互依賴的綜合操作。在軍事安全上希以美國勢力來平衡中、日、印度等國的威脅；在政治上，藉中國以反對美國的「人權外交」與「民主擴展」，避免對東協國家政權統治產生影響；在經濟上，吸引日本、中國與其他東亞國家資金與市場，以減少對美國的依賴（陳奕平，2006）。但如此一來，美國的存在就又因為東協的需求與結構性的條件不足，成為另一種型態的關鍵影響。在此，也可以觀察到東協國內層次與國際權力結構之間相互影響的聯繫關係。

二、戰略條件與操作

冷戰結束後，兩極對抗消失，在強權約制力量快速消失之際，東亞戰略情勢發生重大改變。美國外交上的「退縮」態勢造成其對亞洲的影響力大幅衰減，美蘇撤離的「權力真空」使東南亞國際關係的大國決定態勢式微，東協國家相對擺脫外部大國的支配（Ganesan, 2000: 267）；然而中國卻在累積改革開放的經濟實力之後，無論在其擴張政策或自信心方面均有「稱霸」的表現，更由於南海戰略位置、石油及其他海洋資源的爭議，而在中國的南海領域主權聲明後，對東協形成重大的壓力（Lee, 1999: 9-15; Sokolsky *et al.*, 2000: 33-35）。在處理威脅的思考上，1990 年，「東協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ASEAN-ISIS）建議利用後部長級會議或相關機制，進行安全議題的對話，到 1994 年，東協區域論壇正式成為一種具備「形成中的社群觀」（*emerging sense of community*）的安全建制（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9）強調東協國家扮演領導力量的重要性，於是，東協區域論壇的成立，一般被視為東協「全面羈絆」戰略的實踐，納入對區域事物有所影響與意圖的大國，而企圖透過各大國

間利益衝突的條件，達成「廣泛平衡」(broad-ranging balancing)的對應 (Goh, 2006: 321-323)。在因應中國崛起問題上，東協的核心思考係與中國共同面對西方保護主義，在國際貿易事務中發展共同利益；透過經濟接觸建構中國與東協的經濟互賴與依存，降低南海衝突；藉與中國發展緊密關係提升東協對其他強權的談判地位 (Yee and Storey, 2002: 217)。例如在 2011 年東協第 19 屆高峰會議上，越南總理阮晉勇 (Nguyen Tan Dung) 在南海問題上即提出資源共用、東協共同體建構、按既定規劃執行等方式作為解決爭端的途徑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Vietnam, 2011)，而其企圖則是希望藉由集體力量的發揮，尋求合作空間，套用國際海洋法規範而能與美國、印度等國建構戰略夥伴關係。至於在對外安全關係上，東協一方面確立「東協主導、大國平衡」的戰略原則，積極發展與區域外國家的關係，建立起多層次的論壇式協商制度 (企圖進行調和安全議題的對話)，另一方面則是維持並強化原有與地區外大國 (尤其美國) 之間的雙邊安全合作，並將此類雙邊合作的相關作為詮釋為最有效、最現實的安全模式 (Acharya and Stubbs, 1995: 195)。但事實上，建構東協全面羈絆戰略的基礎在於幾個特定的時空與權力競逐態勢，除前述地緣因素之外，中國崛起需要和平環境的前提、全球化經貿衝擊的事實、美日經濟衰退的促發、反恐戰爭中美國的壓力與相對國家內部的反彈、中美日之間的潛在衝突與利益競合等等國際政經條件的發展與配合，而如此的安全認知建構，則是使東協國家認為有機會可以在大國之間，試圖去進行廣泛的平衡作為的重要關鍵。

整體而言，後冷戰時期東協國家的安全認知，雖已逐步修正為以國家間的相互依存作為政策基礎，認為安全的維繫不僅限於軍力，而與國家的政治穩定、經濟成就與社會和諧、文化發展等議題密不可分 (Dewitt, 1994: 4)。但區域和平的實現須藉區域合作，透

過和平方式防範、遏制、處理各種爭端，提升區域的抗壓力（Djiwandono, 1994: 208）。而此等區域安全戰略操作模式可以區分為：(1) 集體安全操作，藉由東協成員國間的合作關係，增強處理安全事務的能力；(2) 協商與對話機制，透過與大國建立的互信關係，以降低可能的外部威脅；(3) 二軌安全對話，透過東協區域論壇的平台機制，建構多邊安全操作的可能；(4) 調整軍事戰略，以軍事合作、軍力提升，積極開展軍備整備。也因此這樣的關係架構下，東協組織持續成為化解內部成員國間緊張關係的平台，而一致對外的力量建構，則透過東協自由貿易區、東協區域論壇等機制逐步尋求更深化的制度性運作，2003、2011 年東協高峰會的峇里第二、第三協約（Bali Concord II, Bali Concord III）建構東協安全共同體的願景，更以東協憲章（ASEAN Charter）作為共同體的法律基礎，並作為從戰略上削弱中國影響力的機制（Ruland, 2000: 434）。另外，更為廣泛的雙邊軍事合作亦自後冷戰時期開始，逐步在既有的基礎上展開（Nischalke, 2000: 89-112）。⁷

三、戰略局限與發展預估

冷戰結束之後，對東南亞國家來說，中國崛起是一項機會、優勢，在理想上「歡迎一個強大的中國，卻也不願意中國支配」，但就國力而言，事實上並沒有足夠的能力與中國形成穩定、等量的「權力平衡」關係，故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甚至認為「沒有美國就無法維持平衡」，而這也是美國之所以能介入或「必須」介入東南亞，成為「最重要的平衡力量」的原因（Leifer, 2000: 105；Lee, 2010；Huy, 201；聯合報，2011）。為因應區域內不斷變化的安全戰略環

⁷ 1992 年東協新加坡高峰會中，對於鼓勵東協國家在安全問題上進行合作的議題達成共識。

境，美國的軍事存在成為地區和平穩定的基礎，亦為制約中國霸權、促進中國遵守國際規範的重要手段（Emmers, 2003: 112）。如此一來，東協戰略操作的自由度即被對美國的安全依賴所約制。另一方面，引進大國勢力相互牽制以創造東南亞的特殊層級秩序，係近年來東協國家積極想跳脫必須在美中兩強之間選擇的困境，然而如何在「平衡」與「從扈」之間，找到第三條道路，則是另一種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兩難（Goh, 2007b: 113-157）。首先，由於地區的發展程度差異甚大，加上冷戰所造成的裂痕目前並未全然消除，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的博弈，更造成區域整合的進度緩慢、停滯不前（劉學成，2009：7-8）。而各國在社會制度各異，經濟發展不均，種族、宗教、文化互有衝突，領土、領海爭端不斷等狀況下，東協自創立之初就試圖在多樣性中尋求共同性，強調在成員國之間創造和諧關係，不干涉他國內部事務，以協商的方式來尋求一致，實行鼓勵而非懲罰性政策，採漸進合作、避免排他與孤立戰略等方式來進行合作（Harrcke, 2003: 49-50；Evans, 2001: 104）。因此，東協傳統上採取共識決的決策方式，雖然逐漸發展出一定的決策型態，獲致一定的效果，但反復磋商、妥協、達成共識的操作，不但曠日廢時，更因為卻缺乏制度性機制，難以處理多面向議題，也在區域整合時，遭遇主權議題退讓、妥協的困難，最終導致難以針對重大、突發性挑戰達成任何決策（Haji and Ghoshal, 1999: 762-763, 771）。也因此，筆者悲觀的以為：東協在這樣的條件下，若欲建構在「戰略三角模式」（吳玉山，1997）中傾向「三邊家族」的最有利模式變遷，實質上，需要大國的默許，故而難有實踐客觀條件的可能性。

其次，在尊重各國主權獨立的前提下，在對外事務上，東協在制度設計與運作實務中，即無法阻止或約束單邊主義在多邊主義建構的機制內發展，也形成國家利益與區域利益之間的落差與競合（Shibusawa, 1991: 101）。更由於在安全合作議題上，東協國家目

前尚處於須增強彼此信任的低階合作階段，故實現共同目的而進行的功能性合作，至今尚未形成（Sokolsky *et al.*, 2000: 43）。以對華政策而言，各國以本國需求與利益為出發，各自以務實、具體的內容制定其與中國的雙邊關係，在不同的挑戰因素與利益考量下，統一對外政策難以實現，相對也削弱了東協以集體力量影響中國的能力（Tan, 2006: 1-2）。也因此，有學者甚至認為，東協區域論壇要成為有效的安全機制，就需要降低東協的主導性，改採大國多邊合作模式來運作（Huisken, 2002: 187-202）。事實上，東協處理戰略悖離問題的能力，一直備受質疑，東協區域論壇的戰略操作與發展局限，甚至因其凝聚力的缺乏與發展方向的混亂，而被認為是其無法處理地區安全問題的明證（Tan, 2006: 6-7）。

最後就理論與實務的結構性因素方面來看，「全面羈絆戰略」係以大國之間的競爭、搶奪與無法協調，作為其收穫「漁翁之利」的前提，但其中的戰略風險卻有「不可承受之重」，若要符合東協的現實與長遠利益，大國之間持續的既聯合又鬥爭，實為操作之必須。然而，就結構而言，遏制中國的戰略思維，容易形成區域局勢惡化或甚分裂的可能，而「中美日三角關係的穩定，卻又是對東協安全最關鍵的焦點」（Leifer, 2000: 127），問題是，東協似乎沒有操縱（操控）此一形勢發展的有效工具。而且，就理論而言，若實力相對較弱的國家試圖平衡來自大國的威脅、限制強權的軍事能力，不但不切實際，更難以達成其預定目標目標。至於，在權力平衡操作的理論與實務經驗中，「權力平衡」這樣的政治操作，由「大國主導」的態勢甚為明確，東協國家缺乏有利籌碼的缺陷表露無疑。面對中國利用經濟能量的影響，日本在「亞洲 16 國自由貿易區」的議題設定，美國在防止單一國家崛起抵制美國參與的態度與反應等等議題上，東協均無法有效回應（Austria, 2003: 5; Carpenter, 1998: 294; 蔡東杰, 2009）。另外就政治運作的內部邏輯而言，操作大國

相互約制的條件在於大國之間的「無法協調」以及平衡者 (Balancer) 與各大國間的「利益交換」，但東南亞的事實情況卻是美日同盟主導東亞經濟合作，並正逐漸轉化其經濟優勢為政治與安全優勢，再加上日中協調途徑的逐步建構（陳喬之主編，2002：106），使得大國間的協調可能性大為增加，亦相對壓縮東協的操作空間。另外，即便知悉中國積極尋求與東南亞國家建立緊密關係之目的是以經濟帶動外交，制衡美國在東南亞的軍事優勢（Banlaoi, 2003: 103），但東協各國還是保持與中國的相當關係，並期以美國介入作為化解「中國威脅」的主要手段。事實上，引入中國勢力係考量平衡美日影響，但又需要美軍力量以提供安全保障，於是策略上的兩難模式不斷上演，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在戰略對象認知上亦有所不同，畢竟，在競爭性的國際體系中，權力平衡操作最理想的安全狀況是成為對手無法挑戰的霸權國家（Mearsheimer, 2001a: 32-42），而東協國家所欠缺的就是成為霸權國的條件與機會。以東協區域論壇的結構、運作以及地區政治與安全環境來看，由於各國均由本身利益出發，會員國之間的利益衝突無法避免，也使論壇淪為「談話」處所，其制度運作與決議，則僅為大國間的政治妥協的結果（Simon, 1996: 381-396）。而如此的發展，正顯示出東協在美國秩序的約制下，雖有戰略結構上，可以操作的條件，但東協各國之間、國家內部之間的體制、利益衝突、歷史經驗侷限的決策認知，都使各項操作的條件轉換成限制的因素，最後只保有形式上的主動。

柒、東南亞戰略的本質一代結論

當前東亞局勢中，各相關國家有不同的安全追求，美國追求單邊霸權，中國、俄羅斯、日本則或明或暗的有著追求多極化的實踐以及擠身多極之一的政治企圖，而東協國家則期望建立多邊安全協

調機制，於是各種區域安全的安排紛亂雜陳，以各種安全理論架構起來的安全選擇與機制相互交織，論述與主張也多有爭議（Shambaugh, 2005: 12-16, 348）。就結構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戰爭狀態是國與國之間的自然狀態，戰爭隨時可能會因各國的決策而發生；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現實中，「自助原則」是行動者必然的準則（Waltz, 1979: 88, 102, 111）。而亞太安全戰略環境的演變，基本上受到權力、制度與文化等變項同時而交互的影響（Katzenstein and Calson, 2006；Ikenberry and Mastanduno, 2003；McGrew and Christopher, 1998）。樂觀的看法認為，中國崛起的事實但並不能就此認定中國意欲於成為挑戰性軍事大國。相反的，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多數集中在其國內經濟建設的部分（Ross, 1997: 33-44；Shambaugh, 2004: 64-99；Goldstein, 2005）。而且由歷史經驗的另一面向顯示，中國的衰弱將導致亞洲的混亂，相對富有、強大的中國係地區穩定的因素，有助於和平、穩定的秩序再現，即使古代的華夷秩序也是「仁慈霸權」，中國與鄰邦之間維持表像的層級關係，但卻有著平等的內涵，而在實證的觀點下，也不認為目前多數亞洲國家存在制衡中國崛起的作為（Kang, 2003: 57-85；Shambaugh, 2004: 64-99）。但就美國的海洋秩序觀點來看，美國勢力的存在是一種霸權穩定的狀態，對亞太地區的安全利益則在於：能有效約制區域強國間可能的衝突（尤其中日衝突）；可以防止侵略行為，為弱國提供安全保障；能夠提供危機管理，以防止衝突升高至戰爭；能控制武器擴散與區域局勢惡化（Nye, 1995: 90-102；Mearsheimer, 2001b: 46-61）。然而，美國秩序在 21 世紀的東亞則面臨著不同的挑戰：其中，區域外霸權形成的合理性疑慮，致使美國必須尋求日本、中國、俄羅斯或甚印度的支持，另外，地緣戰略的結構性限制亦約制美國在東亞戰略上的自由度，為防止區域大國的崛起必須維持美日、美澳等雙邊同盟關係，而又必須有限度的鼓勵多邊合作。然而，美日同盟必定引發中

國的憂慮，也因此，美國霸權的存在雖有助於區域安全秩序的維持，但只能防範情勢惡化，卻無法解決根本上的區域安全核心問題（例如中日問題）。也因此，美國在戰略目標上，係以維護其霸權地位為核心，維持並控制區域的矛盾與衝突，相對來說也就是避免出現挑戰國家或國家聯盟的有效方式（Alagappa, 2003: 150-157, 160-163；Christensen, 1999: 49-80）。因此，筆者認為如此多元又互斥的論述，恰好提供了在複雜時局中，各方行動作為的理論基礎與正當性論述，也造成不同學術認知與派別的論戰與各自堅持的基礎。故而，欲建構一種共同的學術認知在實踐上甚為困難，也因此，顯現出對權力競逐本質的理解，確有關鍵的重要性。

本質上，冷戰結束與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改變了整個東亞的權力關係，也造成各方巨大的壓力。於是，日本除美日安全同盟外，也積極與東協國家簽署雙邊或多邊經濟夥伴協定，鞏固合作關係，推動自由貿易與經濟整合（Urata, 2005: 71-86）。如此，也使得東協國家在全面羈絆的操作空間上，獲致另一種重要的條件。然而，筆者認為，全面羈絆戰略所面臨的困境與本質性限制卻十分明顯：(1) 無論引入那些強權相互競爭，都無法避免「引狼入室」的可能性，例如北京在 1997 年金融風暴時對東南亞各國的積極貢獻，就成為其扮演區域經濟整合的積極角色的重要資本（Ba, 2003: 622-647），而相對壓縮了東協意欲主導的空間；(2) 大國間平衡的戰略操作，前提在於大國間無法形構「大國協調」，然而即便是最大的利益衝突者—美中之間，由於雙方都須解決國內經濟發展的問題，美國更需要中國在反恐等國際事務上的支援，更重要的是彼此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經濟利益關係（Shambaugh, 2004: 208），因此，所謂「全面羈絆戰略」，本質上只是強權默許的結果；(3) 東協國家反制力量嚴重不足，以 2003 年的「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協議」（China-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CAFTA）來看，表面上似乎是東協

將中國規範入東南亞的區域整合，然而實質上卻是中國在操作東南亞區域經濟戰略與各種經貿手段的一環（鄭又平，2011：33-49），相對東協國家，在整合的過程之中，並無法實質發揮關鍵主導的力量；(4) 缺乏操作工具的困境，由於國力相對落差，東協各國的戰略操作，基本上僅能以地緣條件作為核心的戰略超作工具，以中越、中菲的南海爭議為例，兩國最有力工具就是以金蘭灣與蘇比克灣基地吸引美國的介入，然兩者之間美國只要掌握一個，其戰略意義就可達成，因此，籌碼運用上的戰略主動就轉移到華盛頓手上。因此，筆者認為，東協全面羈絆戰略的運作本質係「大國的同意」，美國因實力衰退與介入正當性限制下的同意，日本因經貿需求與政治大國追求目的下的同意，中國因和平周邊環境需求與突破強權約制企圖下的同意。而國際環境結構的本質則表現在，各國相互不信任、東協內部安全的不穩定性以及缺乏支配性霸權的複雜結構。至於地緣的本質則在於「資源的支配」與「地理的不變特質」交互吸引各方權力競逐的「恆久不變爭議」之上。

透過上述研究，筆者相信，東南亞戰略環境的困境表現在：地緣結構的鄰近與戰略資源支配關係形構出的權力競合與競逐；參與國之間國力的不相對等與合縱連橫；大國介入的必要性與正當性之間的落差；戰略上的交互困局與戰略主動的相互約制等四個面向之上。就域外強權的困境而言，基本上在於介入正當性與權力梯度遞減的事實，於是，合作成為必須的選項，然而合作卻又以自身利益為前提，於是當市場競爭與經濟影響相互作用之時，美日韓傳統的聯盟佈局，就可能約制美軍的軍事存在形式（Obama, 2010: 42-45）。而美國戰略關切的認知基礎，係以持續「在太平洋地區保持足夠力量存在，並顯現不惜訴諸武力使用的意志，才能阻止中國追求東亞霸權的野心」（Auer and Lim, 2001: 139-147），進而呈現出相當的攻勢現實主義發展。然而，中國目前是亞洲最強的大國，日韓等盟

國的戰略操作空間有限，戰略選項也明顯不足。例如，2010 年以前日本似乎希望在經濟上加深中日間的相互依賴，同時持續在安全與戰略上對中國採取第二線的制衡，但在釣魚臺事件的影響下，東京方面正逐步將對抗轉換至檯面。

就中國來說，欲持續經濟發展，和平的環境必須積極建構，然睦鄰政策執行二十年下來，卻依然難以建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和平崛起」的概念依然只是北京的論述而非國際共識；其次，隨著經濟發展牽動的國民自信、民族主義發展，形成內部穩定的隱憂與涉外事務處理空間的限縮；另外，能源需求的急迫性日益嚴重的狀況下，海洋通道、海域資源的掌握，也使協商與讓步可能愈來愈少。以軍事議題為例，近年來解放軍在涉外問題的態度上，一改過去的低調作風而逐漸有愈發強硬的言論（中時電子報，2012），⁸ 隨著中國在軍事實力上逐漸拉近與日本的差距，軍事能力與技術的突破，也使北京方面在對外關係處理上，漸趨開始採取強硬的手段。2011 年，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號」的試航，則使中國「逐步實現海洋霸權戰略」，欲將制海權擴大到第二島鏈的擴張的意圖愈見明顯，也促使周邊國家積極加強軍備，亞太地區的軍事平衡亦因此出現微妙的變化，更意味著中國以武力解決國際爭端的能力與可能性已大幅提升，而區域危機的加乘亦逐漸增加（Bernstein and Munro, 1997a: 25;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0: 31; Chanda, 1995: 24-28; 郭武平等，2006：194；自由時報，201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編，2011：149-151；防衛廳編，2011：75）。因此，筆者認為，「對外和平形象建構難以完成；對內鷹派氣氛難以平撫」實為當前中國戰略困局的關鍵。

⁸ 中共海監總隊黨委書記孫書賢說，像是日本對釣魚台問題，菲律賓與越南對南海問題，如果一直糾葛不清，那麼中國不惜「以戰止戰」。

就東協的困境來看，除前述在實踐過程中，全面羈絆戰略所遭遇的困境之外，若由整體東南亞戰略環境來看，東協區域論壇的理論結構係建立在「權力平衡」的基礎之上，以避免中國或其他域外單一霸權的操作與影響，進而將區域安全相關的主要行為者，均納入多邊安全機制的運作範疇之內（Emmers, 2001: 286-289）。然而其實際運作層次中，將「共識決原則」置於安全合作議題的決策基礎之上，就使得論壇本身限於單純、缺乏交集的漫談平台，而無法觸及安全議題的核心。然而，欲落實「大國協調機制」之可能，則須相對開放主要強權的協商主導權力，在「多極平衡體系」下推動區域安全合作才是關鍵（Scalapino, 2004: 368-377）。但以目前的發展來看，似乎還相當遙遠。⁹ 事實上，東南亞地區經濟互賴發展的環境，在區域安全問題上，新功能主義強調的外溢效果，並未能充分反應，大國意志依然影響全局。以海域劃界爭議為例，馬來西亞、越南曾於 2009 年向聯合國提交其 200 哩海域劃界案（Permanent Mission of Malaysia to the United Nations, 2009），但此舉也立即造成原本互為對抗的中國、菲律賓同時提出強烈的抗議。因此，悲觀地來說，若各國無法培養互信基礎，全面羈絆戰略事實上將無法落實，亦將只是大國政治之中，一個被默許的環節而已（Garofano, 2002: 502-521）。理想上，東亞區域經濟整合將會是未來區域穩定與繁榮的基礎，但如何由理論上的溢出效應，作為政治、安全、社會、文化等領域的地區合作基礎，確實需要建構有效的制度框架、推動共

⁹ 以近年來東協國家推展東亞峰會而言，東協國家真正可以主導的議題其實甚為有限，例如 2011 年 11 月的東亞高峰會中，美國總統歐巴馬不顧中國的反對，支持制定區域行為準則，來處理南海主權爭議（見「歐巴馬展手腕 東亞峰會談南海問題」中央廣播電台，2011 年 11 月 20 日。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328402），這個看似美中對抗的戲碼，其實完全是美國主導的戰略表態，而東亞高峰會僅是提供一個言論的平台而已。

同體的理想、落實區域合作的遂行，才能由經濟上的互賴，制度規範的運作，而能緩解權力失衡的衝擊、防止安全困境的發生(Acharya, 2003: 149-164)。然而，這樣的理想在國際現實與權力競逐的環境下，終究只是「理想」。

整體而言，筆者認為：東協的全面羈絆戰略雖有許多限制與困境，卻可以有以下原則上的啟示。首先，承認國力不足，非合縱連橫無以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生存；其次，善用自身優勢、創造有利環境；再次，利用強權競逐，夾縫求生；最後是，利用內部矛盾、抵銷制度與環境的優勢。至於，「中國是崛起中的霸權」雖屬一種假設性的議題，若由經濟霸權的定義來看，成為霸權國家必須有能力和意願在維繫國際秩序上提供公共財和確保國際政治環境的穩定(Gilpin, 1980)，因此，北京是否能以和平發展為出發點，對於國際安全穩定作出積極貢獻，提供公共財的能力與意願，實為判斷與建構和平崛起的關鍵。而美國對華政策核心是，將中國納入一系列國際體系，在功能性議題上與中國接觸的策略(Shambaugh, 2001: 25-30)，其目的也就在此。相對的，中國對海洋的需求日漸殷切，諸如「沒有海權的大國，其發展是沒有前途的」，「強大的海軍是國內財富積累和民主發展的保證」(張文木，2003：86)等較為強硬的論述，事實上，正是加深周邊國家疑慮的另一種反向的「建構」。如果，「中國與美國的利益，尤其是集中在南中國海及台灣地區的海權利益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衝突」(張文木，2004：1-2)是中國鷹派的主流意見，相對的也就提供我國在操作「台海和平共處、建構中國和平崛起」重要的利基，如此的戰略思考，事實上應該是處於權力競逐邊陲的我國，必須認真思考的面向。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4）。《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中時電子報（2012）。〈南海與釣魚台問題「不惜一戰」〉。<http://news.chinatimes.com/mainland/11050501/132012071200727.html>。2012/7/14 檢索。
- 王正毅（1997）。《邊緣地帶發展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王緝思（2005）。〈美國霸權與中國崛起〉，《外交評論》84: 13-16。
- 王繩祖主編（1995）。《國際關係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自由時報（2011）。〈中國發展航母 實現海洋霸權〉。<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aug/12/today-p9.htm>。2011/12/28 檢索。
- 江澤民（1997）。〈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睦鄰互信夥伴關係〉，《人民日報》，12月17日。
- 何耀光（2008）。《西太平洋海洋秩序》。高雄：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論文。
- 吳玉山（1997）。《抗衡或扞從—兩岸關係新詮：從前蘇聯看台灣與大陸間的關係》。臺北：正中書局。
- 吳俊才（1976）。《東南亞史》。臺北：正中書局。
- 李元謹（2002）。《新馬華人：傳統與現代的對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
- 李文（2003）。《東亞社會變革》。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李曉偉（2008）。〈中國與東南亞合作的地緣戰略思考〉，《雲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5(3): 68-73。

- 沈紅芳（2009）。〈全球經濟衰退對東南亞經濟的影響及危機應對〉，《南洋問題研究》3: 12-19。
- 肖佳靈（2008）。〈當代中國外交研究「中國化」：問題與思考〉，《國際觀察》2: 1-15。
- 肖歡容（2003）。《地區主義：理論的歷史演進》。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 季興國（1994）。《當今世界經濟高速發展的熱點地區：東南亞概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門洪華（2003）。〈中國國家戰略利益的拓展〉，《戰略與管理》2: 83-89。
- 門洪華（2005）。《構建中國大戰略的框架：國家實力、戰略觀念與國際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侯松齡（2000）。〈中國與東盟關係中的不穩定因素：南沙問題〉，《東南亞研究》5/6: 65-69。
- 洪謙德（1995）。《新加坡學》。臺北：揚智出版社。
- 唐世平（2000）。〈理想安全環境與新世紀中國大戰略〉，《戰略與管理》6: 42-49。
- 秦亞青（2003）。〈國家身份、戰略文化和安全利益－關於中國與國際社會關係的三個基本假設〉，《世界經濟與政治》1: 10-15。
- 姚楠（譯），王賡武（原著）（1987）。《東南亞與華人》。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 張小明（1997）。〈中國威脅論的奇怪邏輯〉，《國際政治研究》3: 40-44。
- 張文本（2003）。〈經濟全球化與中國海權〉，《戰略與管理》1: 86-94。
- 張文本（2004）。《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際安全利益分析》。

- 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 張奕善（譯），Hall, D. G. E.（原著）（1982）。《東南亞洲史》。
臺北：國立編譯館。
- 孫英春、丁力、徐藍、韓莉、俞文虹（譯），Burststein, Daniel and
Arne de Keijzer（原著）（1998）。《巨龍》。北京：東方出
版社。
- 張錫鎮（2008）。〈東盟實施大國平衡戰略的新進展〉，《東南
亞研究》3: 20-25。
- 曹雲華（2000a）。《東南亞可持續發展研究》。北京：中國經
濟出版社。
- 曹雲華（2000b）。〈東南亞能源生產消費前景堪憂：南沙問題
更令人關注〉，《東南亞縱橫》5: 16-18。
- 曹雲華（2003）。〈在大國間周旋：評東盟的大國平衡戰略〉，
《暨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3: 15-19。
- 曹鳳中、馬登奇主編（1998）。《綠色的衝擊》。北京：中國環
境科學出版社。
- 陳奕平（2006）。《依賴與抗爭：冷戰後東盟國家對美國戰略
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陳喬之主編（2002）。《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研究》。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郭武平、吳昆財、孫國祥、連錦水、蔡昌言（2006）。〈中國
和平崛起：國際社會之威脅或夥伴？〉，《歐洲國際評論》
2: 167-209。
- 國務院辦公廳（2013）。〈李克強在第十屆中國—東盟博覽會和
商務與投資峰會上致辭〉。[http://big5.gov.cn/gate/big5/www.
gov.cn/guowuyuan/2013-09/03/content_2591011.htm](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guowuyuan/2013-09/03/content_2591011.htm)。2013/
10/5 檢索。

- 國務院辦公廳（2013a）。〈2013 年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白皮書〉。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jrzg/2013-04/16/content_2379013.htm。2014/11/10 檢索。
- 國務院辦公廳（2011）。〈2010 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test/2011-03/31/content_1835465.htm。2014/10/21 檢索。
- 程廣中（1999）。《地緣戰略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 黃朝翰（1990）。《中國與亞太地區變化中的政治經濟關係》。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傅夢孜（2003）。〈布什政府對華政策與中美關係的未來〉，《現代國際關係》1: 17-22。
- 楊達洲（譯），Overholt, William H.（原著）（1996）。《中國的崛起》。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經濟部國貿局（2010）。〈東協國家與中國大陸合組自由貿易區對我國之影響及因應對策〉。http://ekm92.trade.gov.tw/BOFT/OpenFileService?file_id=26a75a416e950825ac2beb096c81b384&context=83ee4cf785ad25a257533d1ac7c3b82f。2010/2/22 檢索。
- 趙崇明（1999）。〈中共當前國際戰略指導原則之探討－「新安全觀」決策的環境因素〉，《共黨問題研究》25(9): 4-17。
- 劉中民（2008）。〈冷戰後東南亞國家南海政策的發展動向與中國的對策思考〉，《國際問題論壇》秋季號：67-82。
- 劉志青（2011）。〈南海問題的歷史與現狀〉。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23187。2011/12/10 檢索。
- 劉咸嶽、黃錚主編（2002）。《2001-2002 年東南亞發展報告》。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 劉學成（2009）。〈東亞共同體構想與美國的東亞戰略〉，《亞

非縱橫》6: 7-11。

鄧小平（1993）。《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鄭又平（2011）。〈從兩岸簽署 ECFA 看中國「經略東亞」大戰略〉，《展望與探索》9(3): 33-49。

鄭永年（2009）。〈中國應變經濟優勢為戰略優勢〉，《東方早報》，10月16日。

蔡東杰（2009）。〈大國各自盤算 東亞共同體前途未蔔〉，《青年日報》，11月12日，國際安全論壇專欄。

蔚文（譯），Naisbitt, John（原著）（1996）。《亞洲大趨勢》。北京：外文出版社。

聯合報（2011）。〈臺灣難拒大陸拉力〉，《聯合報》，9月24日。

嚴智宏（2005）。《東南亞文化教學參考手冊》東南亞文化與社會。南投：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顧長永（2005）。《東南亞政治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二、英文部分

Acharya, A. and Stubbs, R. (1995). *New Challenge for ASEAN-Emerging Policy Issues*. Vancouver, BC.: UBC Press.

Acharya, Amitav (1997). "Ideas,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Building: From the 'ASEAN Way' to the 'Asia-Pacific Way'?" *The Pacific Review* 10(3): 328-333.

Acharya, Amitav (2001).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London: Routledge.

Acharya, Amitav (2003). "Will Asia's Past Be Its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8(3): 149-164.

- Acharya, Amitav (2010). "Asia in the 'New American Moment'." *PacNet*, 49, Oct. 14. <http://www.amitavacharya.com/sites/default/files/Asia%20in%20the%20New%20American%20Moment.pdf>. Retrieval Date: 2014/10/15.
- Alagappa, Muthiah (2003). "Incomplete Hegemony: The United States and Security Order in Asia." In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Order: 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 pp. 141-17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tolik, Michael (1990). *ASEAN and the Diplomacy of Accommodation*. New York: East Gate Books.
- Applebaum, Anne (1995). "Full of Eastern Menace." *The Spectator*, September 23: 10-12.
- ASEAN (2011). "Terms of Reference of the ASEAN-China Joint Working Group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ttp://www.asean.org/asean/external-relations/china/item/terms-of-reference-of-the-asean-china-joint-working-group-on-the-implementation-of-the-declaration-on-the-conduct-of-parties-in-the-south-china-sea>. Retrieval Date: 2013/11/1.
- ASEAN (2014). "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21st ASEAN Regional Forum." Nay Pyi Taw, Myanmar, 10 August. <http://www.asean.org/news/asean-statement-communiqués/item/chairman-s-statement-of-the-21st-asean-regional-forum-2>. Retrieval Date: 2014/11/23.
- Auer, J. E. and Lim, R. (2001). "The Maritime Basis of American Security in East Asi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54(1): 139-147.

- Austria, Myrna S. (2003). *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Approaches and Processes*. Makati City: Philippin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 Awanohara, Susumu (1992). "Washington's Priorities: US Emphasizes Freedom of Navigatio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55(3): 18-19.
- Ba, Alice D. (2003). "China and ASEAN: Renavigating Relations for a 21st-Century Asia." *Asian Survey* 43(4): 622-647.
- Ba, Alice D. (2006). "Who's socializing whom? Complex engagement in Sino-ASEAN relations." *The Pacific Review* 19(2): 157-179.
- Banlaoi, Rommel C. (2003).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Rise of China: Regional Security after 9/11." *Parameters* 23(2): 98-106.
- Barnes, Julian E. (2013). "China-Japan Dispute Puts U. S. in Tricky Spo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5. <http://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127887323807004578286501848686288>. Retrieval Date: 2013/7/15.
- Bernstein, R. and Munro, R. H. (1997a).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Bernstein, R. and Munro, R. H. (1997b).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76(2): 18-32.
- Bert, Wayne (2003).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Besson, Mark (2003). "The ASEAN Plus Three and the Rise of Reactionary Regionalis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5(2): 254-268.
- Betts, Richard K. (1993). "Wealth, Power, and Instability: East

-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8(3): 34-77.
- Boulding, Kenneth E. (1963). *Conflict and Defense: A General Theo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Brzezinski, Zbigniew (1997).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Brown, Jessica (2011). “Balancing China and America in the Asia-Pacific.”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5: 1-15.
- Buendia, Rizal G. (1993). “Colonialism and Elitism in Philippine Political Development: Assessing the Roots of Underdevelopment.” *Philippin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37(2): 141-174.
- Buszynski, Leszek. (1997). “ASEAN’s New Challenges.” *Pacific Affairs* 70(4): 555-577.
- Buzan, Barry (1986). “A Framework for Regional Security Analysis.” In Buzan and Gowher Rizvi (eds.), *South Asian Insecurity and the Great Powers*, pp. 3-33. London: Macmillan.
- Calleo, David P. (1987). *Beyond American Hegemony: the Future of the Western Alliance*. New York: Basic Books.
- Carpenter, Ted G. (1998). “From Intervenor of First Resort to Balancer of Last Resort.” In Selig Harrison and Clyde Prestowitz (eds.), *Asia after the Miracle*, pp. 293-311.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 Casetti, Emilio (2003). “Power Shif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en Will China Overtake the USA?”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0(6): 661-675.
- Chalk, Peter (2005). “Militant Islamic Extremism in Southeast

- Asia.” In Paul J. Smith (ed.), *Terrorism and Violence in Southeast Asia: Transnational Challenges to States and Regional Stability*, pp. 19-37. New York: M.E. Sharpe.
- Chanda, Nayan (1986). *Brother Enemy-The War After the War*. New York: Macmillan.
- Chanda, Nayan (1995). “Fear of the Drago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58(15): 24-28.
- Checkel, Jeffery T. (1999). “Norms,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Europ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3(1): 83-114.
- Cheng, Joseph Y. S. (2003). *Broadening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The Impact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September 11 Incident*.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eng, Chwee Kuik (2005). “Multilateralism in China’s ASEAN Policy: Its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Aspira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Strategic Affairs* 27(1): 102-122.
- Christensen, Thomas J. (1999).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4): 49-80.
- Christensen, Thomas J. (2001).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4): 5-40.
- Chung, Chien-Peng (2007). “Resolving China’s Island Disputes: A Two Level Game Analysi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2(1): 49-70.

- Clinton, Hillary R. (2009). "Press Availability at the ASEAN Summit."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09a/july/126320.htm>. Retrieval Date: 2014/11/23.
- Clinton, Hillary R. (2011).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10, 2011.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 Retrieval Date: 2011/12/21.
- Clinton, Hillary R. (2012). "Remarks at the U.S. Institute of Peace China Conference," March 7.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2/03/185402.htm>. Retrieval Date: 2012/8/4.
- Clinton, Hillary R. (2013). "Remarks on American Leadership,"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anuary 31. <http://www.cfr.org/united-states/remarks-american-leadership/p29911>. Retrieval Date: 2014/7/25.
- Collins, Alan (2000). *The Security Dilemmas of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SEAS.
- Conable, B. B. and Lampton, D. M. (1992). "China: The Coming Power." *Foreign Affairs* 71(5): 133-149.
- Copeland, Dale C. (2001).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Hegemonic Rivalry and the Fear of Decline*.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oronel, Sheila S. (2001). *Investigating Estrada: Millions, Mansions, and Mistresses: A Compilation of Investigative Reports*. Manila: Philippine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 Cossa, Ralph A. (2007). "East Asia Community-Building: Tim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Get on Board." *Issues & Insights* 7(17): 1-12.

- Dahl, Robert A. (1991).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avid, Steven R. (1989). "Why the Third World Matt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4(1): 50-85.
- Denmark, A. M., Xuotong, Y., Yamaguchi, N., Chun, C., Huang, A. C. C., Mohan, C. R., Desker, B., Prasirtsuk, K. and Jennings, P. (2013). "Reg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U.S. Strategic Rebalancing." *Asian Policy* 15: 1-44.
- Desch, Michael C. (1989). "The Keys that Lock up the World: Identifying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Periphe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4(1): 86-121.
- Dewitt, David B. (1994). "Common, Comprehensive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The Pacific Review* 7(1): 1-15.
- Dibb, Paul (1995). *Towards a New Balance of Power in Asia*. London: IISS.
- Dillon, Dana R. (2004). "Southeast Asia and the Brotherhood of Terrorism." *Heritage Lectures* 860: 1-5.
- Djalal, H. and Ian Townsend-Gault (2000). "Preventive Diplomacy: Managing Potential Conflic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Chester A. Crocker, Fen Osler Hampson and Pamela R. Aal (eds.), *Herding Cats: Multiparty Mediation in a Complex World*, pp. 107-133.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 Djiwandono, Soedjati J. (1988).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An ASEAN Perspective, in Pacific Regional Security: The 1985 Pacific Symposiu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 Djiwandono, Soedjati J. (1994).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 ASEAN Perspective." *The Indonesian Quarterly* 22(3): 205-214.
- Donnell, Guillermo O' (1979). "Tensions in the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 State and the Question of Democracy." In David Collier (ed.),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p. 286-302.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rezner, Daniel W. (2007). "The New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86(2): 34-46.
- Economy, Elizabeth (2005). "China's Rise in South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4(44): 409-425.
- Eikmeier, Dale C. (1998). *A Leadership Vacuum: U.S. Ac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ort Leavenworth, Kansas: School of Advanced Military Studies, United State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
- Emmers, Rolf (2001). "The Influenc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Factor within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3(2): 275-291.
- Emmers, Ralf (2003). *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ASEAN and the ARF*.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 Emmerson, Donald K. (2005). "What do the blind-sided see? Reapproaching 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18(1): 1-21.
- Evans, Paul M. (2001). "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Its Discontents in Asia Pacific: The ASEAN Connection." *The American*

- Asian Review* 19(2):99-119.
- Fairbanks, John K. (1992). *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innemore, Martha (1996).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riedberg, Aaron (1993)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8(3): 5-33.
- Friedberg, Aaron L. (1998).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allagher, Michael G. (1994). "China's Illusory Threat to the South China Se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1):169-194.
- Ganesan, N. (2000). "ASEAN's Relations with Major External Power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Strategy Affairs* 22(2): 258-278.
- Garofano, John (2002). "Power, Institutions, and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 Security Community for Asia?" *Asian Survey* 42(3): 502-521.
-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In Clifford Geertz (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pp. 255-310. New York: Basic Books.
- Gilpin, Robert (198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ilpin, Robert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lpin, Robert (1988).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War." *Journal*

-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8(4): 591-614.
- Glosny, Michael A. (2006). "Heading toward a Win-Win Futur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hina's Policy toward Southeast Asia." *Asian Security* 2(1): 24-57.
- Goh, Evelyn (2006). "Great Powers and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Military Technology* 30(1): 321-323.
- Goh, Evelyn (2007a).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a Challeng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0(4): 809-832.
- Goh, Evelyn (2007b).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2(3): 113-157.
- Goldstein, Avery (2005).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ji, Z. and Ghoshal, B. (1999). "The political future if ASEAN after the Asian crisis." *International Affairs* 75(4): 759-778.
- Harrcke, Jurgen (2003). *ASEAN's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Culture: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New York: Routledge.
- He, Yafei (2013). "The Trust Deficit, How the U.S. 'pivot' to Asia looks from Beijing." *Foreign Policy*.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3/05/13/how_china_sees_the_us_pivot_to_asia. Retrieval Date: 2014/11/14.
- Herz, John H. (1959).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ill, Christopher R. (2005). "Emergence of China in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nsequences for the U.S." <http://2001-2009.state.gov/p/eap/rls/rm/2005/47334.htm>. Retrieval

Date: 2006/5/14.

- Hoehn, A. R., Grissom, A., Ochmanek, D., Shlapak, D. A. and Vick, A. J. (2007). *A New Division of Labor: Meeting America's Security Challenges Beyond Iraq*. Santa Monica, CA.: the Rand Corporation.
- Huisken, Ron (2002). "Civilizing the Anarchical Society: Multilateral Security Processes in the Asia-Pacific."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4(2): 187-202.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3): 22-49.
- Huy, Duong Danh (2011).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China, other claimants and the US." <http://english.vietnamnet.vn/en/special-report/10855/south-china-sea-disputes--china--other-claimants-and-the-us.html>. Retrieval Date: 2011/8/2.
-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 (2010). *Asian Defence Yearbook 2010*. New Delhi: Asian Defence Journal.
- Ikenberry, G. J. and Tsuchiyama, J. (2002). "Between Balance of Power and Community: the Future of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2(1): 69-94.
- Ikenberry, G. J. and Mastanduno, M. (eds.) (2003).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Ikenberry, G. J. and Slaughter, A. M. (eds.) (2006). *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kenberry, G. John (1998).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3): 43-78.
- Ikenberry, G. John (2008).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87(1): 23-37.
- Islam, Syed Serajul (1988). “The Islamic independence Movements in Patani of Thailand and Mindanao of the Philippines.” *Journal of Asian Survey* 38(5): 441-456.
- Joffe, Josef (1995). “Bismarck, or Britain? Towards a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fter B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4): 94-117.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2003).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4): 5-56.
- Johnston, A. I. and Ross, R. S. (eds.) (1999).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 Kagan, Robert (2008). “Behind the ‘Modern’ China.”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3: B07.
- Kang, David C. (2002). *Crony Capitalism: 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 Korea and the Philippine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ang, David C. (2003).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4): 57-85.
- Kasuya, Yuko (2005). “Patronage of the past and future: Legislators’ decision to impeach President Estrada of the Philippines.” *The Pacific Review* 18(4): 521-540.
- Katzanstein, P. and Calson, A. (eds.) (2006). *East Asian Security in the Transi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eohane, R. O. and Nye, J. S. (1989). *Power and Inter Dependence*.

-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 Keohane, Robert O.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errey, R. J. and Manning, R. A. (2001).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east Asia: A Policy Agenda for the New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Khalilzad, Z., Orletsky, D. T., Pollack, J. D., Pollpeter, K. L., Rabasa, A., Shlapak, D. A., Shulsky A. N. and Tellis A. J. (2001).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toward a New U.S. Strategy and Force Posture*. Santa Monica, CA.: the Rand Corporation.
- Kim, Kyung-Won (1997). "Maintaining Asia's Current Peace." *Survival* 39(4): 52-64.
- Kim, Woosang (2002). "Power Parity, Alliance, Dissatisfaction, and Wars in East Asia, 1860-1993."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6(5): 654-671.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81).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5(2): 242-254.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86).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without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1): 1-13.
- Kissinger, Henry A. (2012). "The Future of US-Chinese Relations: Conflict Is a Choice, Not a Necessity." *Foreign Affairs* 91(2): 44-55.
- Kleine-Ahlbrandt, S and Small, A. (2008). "China's New Dictatorship Diplomacy. Is Beijing Parting With Pariahs?" *Foreign Affairs*

- 87(3): 38-56.
- Kraft, Herman Joseph S. (2000). "ASEAN and Intra-ASEAN Relations: Weathering the Storm." *Pacific Review* 13(3): 453-472.
- Krasner, Stephen D. (1983).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ristof, Nicholas D. (1993).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72(5): 59-74.
- Kugler, J. and Tammen, R. (2004). "Regional Challenge: China's Rise to Power." In Jim Rolfe (ed.), *Asia-Pacific Region in Transition*, pp. 33-53. Honolulu: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 Kupchan, Charles A. (1998). "After Pax American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a Stable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2): 40-79.
- Kupchan, Charles A. (2002).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Kurlantzick, Joshua (2006). "China's Charm Offensive in Southeast Asia." *Current History* 105(692): 270-276.
- Laird, Melvin R. (1972). *The Nixon Doctrine*. Washington, D.C.: Town Hall Meeting.
- Lampton, David M. (2003). "The Stealth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The National Interest* 73: 37-48.
- Lee, Lai To (1999).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alogues*.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 Lee, John (2010). "The End of the Charm Offensive." *Foreign*

- Policy*, 26 October,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10/26/the_end_of_the_charm_offensive. Retrieval Date: 2010/10/27.
- Leifer, Michael (2000). *Singapore's Foreign Policy: Coping with Vulnerability*. London: Routledge.
- Lemke, D. and Tammen, R. (2003).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29(4): 269-271.
- Len, Christopher (2007). "Energy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Asia: An ASEAN-SCO Energy Partnership?" In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ed.), *Energy Perspectives on Singapore and the Region*, pp. 156-175.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Leo, Suryadinata (1997).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Liu, Fu-Kuo (2008). "Beijing's Regional Strategy and China-AS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China Brief* 8(10). http://www.jamestown.org/programs/chinabrief/single/?tx_ttnews%5Btt_news%5D=4916&tx_ttnews%5BbackPid%5D=168&no_cache=1#.UyUa7X6KC1s. Retrieval Date: 2010/11/10.
- Lohman, Walter (2007). "Guidelines for U.S.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Backgrounders*, No. 2017, March 20, 2007.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07/03/guidelines-for-us-policy-in-southeast-asia>. Retrieval Date: 2008/3/15.
- Lum, Thomas et al. (2008). *Comparing Global Influence: China's and U.S. Diplomacy, Foreign Aid,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 Mahbubani, Kishore (2008). *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 Manyin, M. E., Daggett, S., Dolven, B., Lawrence, S. V., Martin, M. F., O'Rourke, R. and Vaughn, B. (2012). "Pivot to the Pacific?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balancing' Toward Asi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rch 28, 2012,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 McCloud, Donald G. (1986). *System and Process in Southeast Asia: The Evolution of a Regio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McGrew, A. and Christopher, B. (eds.) (1998). *Asia-Pacific in the New World Or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earsheimer, John (2001a).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Mearsheimer, John (2001b).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Pacifier." *Foreign Affairs* 80(5): 46-61.
- Medeiros, Evan S. and Fravel, M. T. (2003).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82 (6): 22-35.
- Mendez, Ruben P. (1999). "Peace As A Global Public Good." In Inge Kaul, Isabelle Grunberg and Marc A. Stern (eds.),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pp. 382-41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rcer, Jonathan (1995). "Anarchy and Ident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2): 229-252.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Vietnam (2011). "Prime Minister Dung Calls for Greater Efforts for ASEAN Community." Nov. 17. <http://www.mofa.gov.vn/en/nr040807104143/nr040807105001/>

- ns111121153116/view. Retrieval Date: 2014/10/4.
- Moore, Thomas G. (2001). "In pursuit of open markets : U.S. economic strategy in the Asia-Pacific." *Asian Affairs* 28(3): 170-179.
- Narine, Shaun (2004). "State Sovereignty,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Regional Institutionalism in the Asia-Pacific." *The Pacific Review* 17(3): 423-450.
-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2000). *Global Trend 2015: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 Expert*. Washington DC: GPO.
- Naya, Seiji and Plumer, M. G. (1997). "Economic Cooperation after 30 years of ASEAN."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14(2): 117-126.
- Nischalke, Tobias Ingo (2000). "Insights from ASEAN's Foreign Policy Co-Operation: The 'ASEAN Way', a Real Spirit or a Phanto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2(1): 89-112.
- Nischalke, Tobias Ingo (2000). "Insights from ASEAN's Foreign Policy Co-operation: The ASEAN Way, a Real Spirit or a Phanto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Strategic Affairs* 22(1): 89-112.
- Nye, Joseph S. (1971). *Peace in Parts: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in Regional Organiz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 Nye, Joseph S. (1995). "East Asian Security: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74(4): 90-102.
- Nye, Joseph S. (2000).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New York: Longman.
- Obama, Barack (2010).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0*. Washington,

- D.C.: White House.
- Olson, Mancu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rganski, A. F. K. (1968). *World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arker, Geoffrey (1998).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and Washington: Pinter.
- Pasadilla, G. and Liao, C. (2005). "Who are Opposed to Free Trade in the Philippines." *Philippin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32(1): 1-17.
- Permanent Mission of Malaysia to the United Nations (2009). HA41/09, August 21, 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mysvnm33_09/mys_re_phl_2009re_mys_vnm_e.pdf. Retrieval Date: 2011/8/18.
- Preston, Andrew D. (2013). *The Asia Pacific Rebalance: Tipping the Scale with Landpower*. Carlisle, Pennsylvania: Th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of the US Army War College.
- Rabasa, Angel M. (2001). *Southeast Asia After 9/11: Regional Trends and U.S. Interests*. Santa Monica, CA.: the Rand Corporation.
- Rachman, Gideon (1996). "Containing China." *Washington Quarterly* 19(1): 129-139.
- Ravenhill, John (1995).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Changing Incentives." *Asian Survey* 35(9): 850-866.
- Rice, Condoleezza (2000).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79(1): 45-62.

- Rose, Gideon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51(1): 144-172.
- Ross, Robert S. (1997). "China II: Beijing as a Conservative Power." *Foreign Affairs* 76(2): 33-44
- Ross, Robert S. (1999).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4): 81-118.
- Ross, Robert S. (2010). "The Rise of Chinese Power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al Security Order." *Orbis* 54(4): 525-545.
- Ross, Robert S. (2012). "The Problem with the Pivot: Obama's New Asia Policy Is Unnecessary and Counterproductive." *Foreign Affairs* 91(6): 70-82.
- Roy, Denny (ed.) (1997). *The New Security Agenda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Rozman, Gilbert (2006). "Cultural Prerequisites of East Asian Region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Korea Observer* 37(1): 149-179.
- Ruland, Jurgen (2000). "ASEAN and the Asia Crisis: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Consequences for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ism." *The Pacific Review* 13(3): 421-451.
- Scalapino, Robert A. (2004). "Asia-Pacific Security: The Current Balance of Pow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8(3): 368-377.
- Schwarz, Adam (1994). *A Nation in Waiting: Indonesia in the 1990s*. St. Leonards: Allen & Unwin.
- Schweller, Randall L.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1):

- 72-107.
- Segal, Gerald (1988). "As China Grows Stro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64(2): 217-231.
- Segal, Gerald (1996). "East Asia and the Constraintment of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4): 107-135.
- Shambaugh, David (2001). "China or America: Which is the Revisionist Power." *Survival* 43(3): 25-30.
- Shambaugh, David (2004).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9(3): 64-99.
- Shambaugh, David (2004).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September 11: Can the New Stability Last?" In Guoli Liu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pp. 197-207.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Shambaugh, David (ed.) (2005).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hibusawa, Masahide (1991). *Pacific Asia in the 1990s*. London: Routledge.
- Simbulan, Roland G. (2007). "Contemporary Politics in the Philippines: The Configuration of Post-EDSA I Political Parties." In Bobby M. Tuazon (eds.), *Oligarchic Politics: Elections and the Party-List System in the Philippines*, pp. 22-46. Diliman, Quezon City: CenPEG Books.
- Simon, Sheldon W. (1996). "Alternative Visions of Security in the Asia Pacific." *Pacific Affairs* 69(3): 381-396.
- Simon, Sheldon W. (2012). "Conflict and Diplomac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View from Washington." *Asian Survey* 52(6): 995-1018.

- Snitwongse, Kusuma (1999).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Changing Southeast Asia." In Robert Scalapino and Sung-Joo Han (eds.), *Regional Dynamics: Securit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pp.39-59. Jakarta: Center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 Snyder, Craig A. (1999). "Regional Security Structures." In Craig A. Snyder (ed.), *Contemporary Security and Strategy*, pp. 102-119. London: Deakin University.
- Sokolsky, R., Rabasa, A. and Neu, C. R. (2000). *The Role of Southeast Asia in U.S. Strategy toward China*. Santa Monica, CA.: the Rand Corporation.
- Storey, Ian (2007).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EAN-China Relations: All Quiet on the Southeast Asian Front*. Carlisle, Pennsylvania: Th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of the US Army War College.
- Sukma, Rizal (2004). "Indonesia and Regional Security: The Quest for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Seng Tan and Amitav Acharya (eds.), *Asia-Pacific Security Cooperatio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Regional Order*, pp. 71-87. Armonk, NY, and London: M.E. Sharpe.
- Swaine, M. D. and Tellis, A. J. (2000).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anta Monica, CA.: the Rand Corporation.
- Swaine, Michael (2004). "Trouble in Taiwan." *Foreign Affairs* 83(2): 39-49.
- Thakur, Ramesh (2013). "Turning China into an Enemy." *The Japan Times*, February 7, <http://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3/02/07/commentary/world-commentary/turning-china-into-an->

- enemy/. Retrieval Date: 2013/11/3.
- Tan, Andrew T. H. (2006). *Southeast Asia: Threats in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International.
- Taylor, Carl (1963). "Indonesian Views of China." *Asian Survey* 3(3): 165-172.
- Urata, Shujiro (2005). "Japan's FTA Strategy and a Free Trade Area of Asia Pacific." In Takatoshi Ito, Hugh Patrick and D. E. Weinstein (eds.), *Reviving Japan's Economy*, pp. 71-86.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U.S. Commission on National Security/21st Century (2000). *Seeking a National Strategy: A Concert for Preserving Security and Promoting Freedom*. Washing DC: GPO.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0).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10*. Washington, D. C.: Department of Defense.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2). Secretary of Defense Speeches: "Shangri-La Security Dialogue." As Delivered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Leon E. Panetta, Shangri-La Hotel, Singapore, June 02. <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681>. Retrieval Date: 2013/5/25.
- U.S. Department of the Navy (2010). *Naval Operations Concept 2010: Implementing the Maritime Strategy*.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the Navy.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95). "Spratlys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aily Press Briefing. http://dosfan.lib.uic.edu/ERC/briefing/daily_briefings/1995/9505/950510db.htm. Retrieval Date: 2001/1/24.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9). "Chairman's Statement: The Fourth

- ASEAN Regional Forum Ministerial Meeting.” Subang Jaya, Malaysia, 27 July 1997. <http://2001-2009.state.gov/t/ac/csbn/rd/4374.htm>. Retrieval Date: 2010/3/2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2). “Maritime Territory Disputes and Sovereignty Issues in Asia.” September 20, 2012.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12/09/197982.htm>. Retrieval Date: 2013/2/12.
- Valencia, Mark J. (1986). “Taming Troubled Waters: Joint Development of Oil and Mineral Resources in Overlapping Claim Areas.” *San Diego Law Review* 23(3): 661-684.
- Vaughn, B. and Morrison, W. M. (2006). *China-Southeast Asia Relations: Trend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Waldron, Arthur (1995). “Deterring China.” *Commentary* 100(4): 17-21.
- Walt, Stephen M. (2002). “American Primacy: It’s Prospects and Pitfall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52(2): 9-28.
- Waltz, Kenneth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 Wang, Jianwei (2003).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Asian Security: Sources, Management, and Prospects.” In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Order: 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 pp. 380-423.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endt, Alexander (1992).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2): 391-425.
- Wendt, Alexander (1994).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2):

384-396.

White, Hugh (2012). *The China Choice: Why America Should Share Power*. Collingwood: Black Inc Books.

Wight, Martin (1978). *Power Politic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Wohlforth, William (1993). *The Elusive Balance: Power and Percep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u, Xinbo (2012). “Forging Sino-U.S. Partnership in the 21st Centur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1(75): 391-407.

Yee, H. and Storey, I. (2002). *The China Threat: Perceptions, Myths, and Re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Zakaria, Fareed (1992).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1): 177-198.

Zakaria, Fareed (2008).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How America Can Survive the Rise of the Rest.” *Foreign Affairs* 87(3): 18-43.

Zhu, Feng (2012).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balancing toward Asia and Sino-U.S. Relations.” I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Review 2012*, pp. 18-37.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三、日文部分

古森義久（2011）。〈中国の領土拡大は唯我独尊のアナクロニズム的中華思想と識者〉2011年7月20日。http://www.excite.co.jp/News/world_g/20110713/Postseven_24779.html。

2012/5/22 檢索。

村井友秀（1990）。〈新・中国「脅威」〉，《諸君》22(5): 186-197。

防衛廳編（2011）。《日本の防衛：防衛白書（平成 23 年版）》。

東京：ぎょうせい。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編（2011）。《東アジア戦略概観 2012》。東

京：ジャパントイムズ。

岡倉古志郎（1967）。《アジア・アフリカ問題入門》。東京：

岩波書店。

Multiple Dilemmas in Strategic Operations in Post-Cold War Southeast Asia:

China vs ASEAN

Yao-Kuang Ho^{*}

Abstract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a constant feature in Southeast Asia's strategic and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 has been that all states face multiple strategic and security dilemmas.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power competition, all of the ASEAN states are relatively weak. Internal integration problems and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seem to destine them to remain in weak positions. At the same time, while China's needs stability and security on its periphery in order to rise, its rising power has created insecurity in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fact, the strategic operations of both ASEAN states and China are constrained by and respond to the US maritime order. In examining strategic behavior in Southeast Asia, it is important to consider strategic choice is constrained by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of power, the security perceptions of decision-makers, and domestic political factors.

Keywords: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maritime order, Asia-Pacific flash points, Southeast Asia geostrategic environment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I-Shou University. Ph. D. in Social Science, Institute for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for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Specialties: geopolitics and geostrategy, maritime history,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ar studies, modern history, regional studies. Email: walterho61@isu.edu.tw.

